

# 呈現隱形數據

以2030年為目標改寫女童及婦女一生



Because I am a Girl  
愛·女孩

PLAN INTERNATIONAL

國際培幼會

本會已盡力確保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出版時均屬正確，且所有資料來源已獲引用，國際培幼會概不就任何不準確之處負責。

本刊物所表達的看法和意見並不一定代表國際培幼會的官方政策。

本刊物可供部分複製以作研究、倡議和教育用途，惟必須列明出處。未經國際培幼會事先許可，不得複製本刊物作其他用途。

建議引用格式：國際培幼會：《呈現隱形數據：以2030年為目標改寫女童及婦女一生》（英國沃金：國際培幼會，2016年）。

ISBN 978-1-906273-75-0（英文版本）

© 國際培幼會

2016年10月

封面圖片 © 國際培幼會 / Flemming Gernyx / Epworth鎮學校的女童，該處為津巴布韋哈拉雷東面的非正式聚落。



《呈現隱形數據》得以成功面世，全賴多方人士和機構的指引、協作和貢獻。本會衷心感謝各位在本報告的製作上付出寶貴時間、專業知識和支持。特別鳴謝以下人士：

### 國際培幼會

行政總裁Anne-Birgitte Albrechtsen；研究及知識管理總監Jacqueline Gallinetti；環球合作關係總監Gordon Glick；署理環球影響及合作關係執行總監Sean Maguire。

### 政策與計劃指引

Leila Asrari、Anne-Claire Blok、Mary Bridger、Stefanie Conrad、Tanya Cox、Rosamund Ebdon、Amanda Lundy、Alex Munive、Zara Rapaport、Adam Short、Johanne Westcott Simpson及Alison Wright。

### 外部審閱員

Alexandra Farnum及Erin Hohlfelder（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Emily Courey-Pryor、Rebecca Furst-Nichols及Stephanie Oula（Data2X）；Shannon Kowalski、Helena Minchew及Susan Wood（國際婦女健康聯盟）；Trevor Davies、Kate Maloney及Timothy A. A. Stiles（畢馬威）；Emily Huie、David McNair及Kate Van Waes（ONE Campaign）；以及Katja Iversen和Susan Papp（Women Deliver）。

### 供稿者

感謝以下人士提供卓越文章：Mayra Buvinic和Ruth Levine（Data2X）；Gaëlle Ferrant、Keiko Nowacka和Annelise Thim（經合組織發展中心）；Eloise Todd（ONE Campaign）；以及Katjalversen（Women Deliver）。

### 初步研究

首席研究員及作者Jean Casey。特別感謝尼加拉瓜國際培幼會及津巴布韋國際培幼會研究團隊為本研究所作的寶貴貢獻，特別是尼加拉瓜的Pedro Sanchez和Johana Chevez、津巴布韋的Bartholomew Mupeta博士和Nobesuthu Mgutshini、所有參與研究的女童，以及幫助推動研究的研究助理。另亦感謝為我們進行數據分析的Linda Campbell，以及擔任外部顧問的Terry Roopnaraine博士。

### 傳訊團隊

Keira Dempsey、Sandra Dudley、Carla Jones、Davinder Kumar、Leila Lahfa、Piers Nutbrown、Danny Plunkett。

### 報告團隊

首席作者及總編輯：Zahra Sethna  
事實查證：Yasmine Hage  
文稿編輯：Catherine Rutgers  
翻譯：Prime Production Ltd.

### 設計

Alan Bingle及Michael Sullivan、Forty6 Design, [www.forty6design.com](http://www.forty6design.com)



# 呈現隱形數據

## 以2030年為目標改寫女童及婦女一生

在塞拉利昂莫揚巴區步行上學的學生。  
國際培幼會 / Vincent Tremeau





# 目錄

## 4：序

從議程到行動

## 6：引言

與婦女和女童攜手合作爭取權益

## 8：第一章

革命繼續前行

未來願景

9

創始合作夥伴簡介

11

焦點議題：當我們在女童和婦女身上投放資源，  
所有人都是贏家 – Katja Iversen (Women Deliver)

13

## 14：第二章

隱形的女童、隱形的婦女

分類的需要

15

追蹤女童和婦女目標的進度

16

焦點議題：劣質數據是否比沒有數據更差？  
– Mayra Buvinic及Ruth Levine (Data2X)

18

## 20：第三章

數據的作用和限制

數據與人權

22

以數據加快運動進程

23

焦點議題：貧窮是性別歧視；全球目標不應如此  
– Eloise Todd (ONE Campaign)

26

## 28：第四章

女童分享看法

更深入瞭解

29

國家研究結果：尼加拉瓜

30

國家研究結果：津巴布韋

33

初步研究的發現

37

焦點議題：量度性別不平等的驅動力 — Gaëlle  
Ferrant、Keiko Nowacka及Annelise Thim  
(經合組織發展中心)

38

## 40：第五章

採取行動的呼籲

加入行動；所有人都有其角色

42

## 43：附表

DATA2X發現的關鍵性別數據缺口

## 44：參考資料



## 序

# 從議程到行動



國際培幼會行政總裁Anne-Birgitte Albrechtsen剖析本會致力以合作行動確保每一位女童和婦女的地位都得到重視，而且被納入統計數據的原因。

「不讓任何一人掉隊」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核心。Women Deliver在2016年5月假哥本哈根舉行了第四屆環球會議，主題正是如何向每位女童和婦女實踐該承諾。該會議是過去十年來最大型的婦女會議之一，近6,000名倡議者、推動者、決策者和業界人士聚首一堂；這也是在各國採納《可持續發展議程》後舉行的首個大型論壇之一。

會議期間，有幾項主題得到強烈反響：樂觀的情緒、更新的目標，還有需要更多更準確的數據以加快進程。正如梅琳達·蓋茨一針見血地指出：「除非我們先收窄數據差距，否則不可能拉近性別差距。」<sup>1</sup>

因此，國際培幼會在會上推動想法相近的公民社會和私營機構夥伴攜手開展一項獨立計劃，以在全球目標的15年年期內追蹤與女童和婦女相關的目標的進展。

巴西一項女孩領袖培訓計劃的成員一同自拍。  
國際培幼會 / Natalia Moura

計劃的願景非常簡單：在 2030 年前以改善性別數據為決策和投資提供資料，改變女童與婦女的生命。

Women Deliver 會議強烈呼籲各界採用不同的處事手法，包括新的思維和新的合作形式，讓全球目標得以實現。我們正向著這個方向邁進：我們的合作關係凝聚來自不同界別、世界不同地方的組織，女童和婦女運動支持者都參與其中，這份報告亦是我們的工作成果。

在 2007 至 2015 年間，國際培幼會以年度報告《世界各地女童狀況》（*State of the World's Girls*）作為推動倡議的工具，凸顯了一些女童面對的挑戰。本會的年報每年都圍繞不同主題，有助確保將女童問題納入國際議程。

《呈現隱形數據》是一個過渡，報告以《世界各地女童狀況》報告為基礎，為一系列創意報告開拓了新路徑，深入探討數據背後的意義，並把焦點集中於數據、夥伴合作和《可持續發展議程》。

隨著合作關係的建立，我們將繼續更有效地使用已知事物和提出我們不知道的事物，把隱形人事帶到各界眼前。我們將努力令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與女童和婦女相關的重要數據和分析，特別是那些需要有關數據的人士；我們將公佈取得進展的地方，並提出哪些地方需要加倍努力；我們將與基層組織合作，確保其擁有工具和技巧令各國政府時刻警醒，實踐承諾。

在整項計劃推行期間，我們將透過公佈女童與婦女所面對的障礙和她們克服這些障礙的第一手資訊，發表「有靈魂的數據」，為重要議題發聲，讓更多人聽到女童與婦女的聲音。





## 引言

# 與婦女和女童攜手 合作爭取權益

婦女在布基納法索Koupela鎮的學校  
花園內打理植物。  
國際培幼會 / Alf Berg



可持續發展目標（簡稱「全球目標」）承諾於 2030 年前改變我們的世界，涵蓋消除貧窮、零飢餓、減少不平等、改善健康與教育和對抗氣候轉變。

為達成這些抱負，我們必須首先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大部分的目標和具體目標並非完全可以量度。以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加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為例，在 14 項用以量度的指標中，大部分國家僅就其中三項定期收集數據和採用商定的統計方法。<sup>2</sup> 其他數據仍需琢磨及／或更廣泛地收集。

各項目標都出現同樣問題。在 231 項官方指標中，少於一半擁有全球數據和採用已商定的標準與方法。<sup>3</sup> 這點必須得到重視，因為女童和婦女目標的進程並不限於一項目標。每一項目標必須得到充分衡量，因為每一項都直接或間接地觸及所有人的生活。

數據並不是唯一的答案，但它們卻是創造重大改革的基本元素。穩健、可信的數據有助查找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衡量方法是否有效，並判定哪些計劃和政策最具影響力。

全球目標的成功，部分有賴於改善數據收集、分析、發佈和使用的方法。這方面並無解決捷徑。除了耐力和堅持，性別數據的革命將需要增加投資、能力、政治意願和公眾需求才可實現。各國政府、學術界、公民社會和工商各界均需要積極參與追蹤進度的工作，確保數據的可信性，合力消除性別歧視。



《呈現隱形數據：以2030年為目標改寫女童及婦女一生》探討了性別數據的現況。本報告識別出部分在未來15年需要採用的方針，並介紹一套由國際培幼會發起和注入新活力的合作計劃。

**第一章**描述了由國際培幼會組成的夥伴聯盟，旨在衡量與監察與女童和婦女相關的全球目標的進度。這章介紹了六大創始夥伴的資料，詳列合作計劃的願景和計劃意願，即成為資訊來源的領導者，確保各國政府和其他持份者負責任地實踐打擊性別不平等的承諾。

**第二章**解釋「性別數據」的定義及其重要性，探討為呈現組別之間與之內的差異與不平等情況而作更有效分類的需要，並找出一些有需要加強的指標，方便在未來15年內追蹤與女童和婦女相關的全球目標的進度。

**第三章**詳列一些數據收集和分析所面對的限制和挑戰，審視有關數據倫理、保護和人權議題相關的問題，並提供數據如何有助推動重大改革的例子。

**第四章**顯示質性研究如何配合量化數據反映具有價值的見解，並探討被邊緣化的女童的實況和經驗，報告在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韋就少年進行的初步研究和第一手資料的主要發現。

**第五章**是本報告的結論篇：呼籲各單位採取行動，例如製作數據者把數據發佈並讓數據易於使用，使用數據者則在數據上凸顯女童和婦女情況，而手上沒有數據者則提出取得數據的要求。本章並就以下需要提出個別建議：

- **加快推動性別數據的革命。**提升我們對女童與婦女的生活、身心健康和福祉的現有知識，能在2030年前達成全球目標發揮關鍵作用。
- **投資於並加強國家統計學能力。**只有穩健可靠的數據，才可以把最被排除在外的社群納入數據，確保數據沒有讓任何一個人掉隊。

- **提倡不同種類與來源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我們需要收集各種資料，確保我們準確量度和回應女童與婦女在未來15年的經歷和實況。
- **利用數據和證據推展行動和建立運動。**數據不只是數字，也關乎其背後的故事；數據在女童與婦女權益倡議者手上，可以變成極富力量的工具。
- **確保數據收集與分析安全並符合道德標準。**重要的不只是數據分享，而是所有人都有責任保護被調查者的人身安全，免其因數據濫用問題而受傷害。

《呈現隱形數據》也帶出了倡議者、數據專家與研究人員的觀點，就需要做什麼，以及如何達成目標提出例證。

Women Deliver的Katja Iversen討論為什麼在女童與婦女身上投放資源，包括為她們投資和投資在關於她們的數據上，是為所有人推動進程的最精明方法。

來自Data2X的Mayra Buvinic和Ruth Levine詳列源自「劣質數據」和「沒有數據」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相較沒有數據而言，關於女童與婦女的劣質數據通常更為危險。

ONE Campaign的Eloise Todd探討數據在有效倡議上的角色，以該組織的「貧窮是性別歧視」（Poverty is Sexist）運動作為例子，說明數據不足為他們帶來的挑戰。

最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的Gaëlle Ferrant、Keiko Nowacka與Annelise Thim闡述怎樣使用社會習俗性別指數來追縱態度、認知與社會規範的轉變，並以烏干達的國家研究為例，凸顯社會規範與習俗如何影響女童早婚的趨勢。

## 第一章

# 革命繼續前行



新晉電台記者在塞拉利昂Makeni鎮接受培訓。  
Gina Nemirofsky / 10x10act.org



## 時至今日，性別平等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是未兌現的承諾。

女童與婦女的生活在近數十年有了顯著進步。在生產過程中死亡的女童和婦女已有所減少，<sup>4</sup>更多女童在接受小學教育，<sup>5</sup>童婚率正在下降，<sup>6</sup>而過去十年女性國會議員的數目不斷增加。<sup>7</sup>每天都有不同人士加入，積極為女性權益發聲，確保女童與婦女不但被納入發展議程，更成為議程的主角。

然而，這段路程並不平坦。性別平等和女童及婦女被賦予權能，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是有待實現的承諾。2014年，超過一億名生活於低至低中收入國家的年輕婦女不懂閱讀完整或部分句子。<sup>8</sup>更有可能繼續失學。<sup>9</sup>每個地區的婦女都比男性花更多時間在護理等無償工作，以及煮食、清潔等家務，令她們只有較少時間學習、休息和照顧自己。<sup>10</sup>在所有有數據的國家中，婦女所賺取的收入均較男性少。<sup>11</sup>

儘管現時已有多項獲廣泛採納的國際協議，例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北京宣言暨行動綱要》，以及《可持續發展議程》，但以上各種情況仍然存在。

該議程和當中所載的全球目標中，有特定目標實現性別平等，並增進婦女和女童的權能；議程也清楚肯定了女童與婦女的貢獻是推進整個議程的重要元素。全賴倡議者不斷努力，大部分與女童和婦女相關的目標均已制訂具體目標與衡量指標。

但若無法充分量度實現目標和衡量指標的工作進度，這些目標和衡量指標又有何用？

雖然大部分顯著的成就都在《千禧發展目標》年代取得，而努力實現那些目標時，各國都主要採用國家平均數來量度成就。達致廣泛涵蓋的策略很多時都聚焦於最容易接觸或情況最容易改善的社群。

很多最貧窮、最難接觸和最被排除在外的人，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女童與婦女都被隱形，在社會的邊緣中掙扎求存。

在未來15年，國際社會在評估進度時，必須更深入觀察統計學平均數以外的數據。我們必須確保沒有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特別是那些因為本身性別、年齡、種族、族裔背景、宗教、性取向、身體殘障、遷居或經濟狀況等而面對重大不利條件的一群。

這將需要回應多項重要挑戰，包括建立政治意願，以拉近差異和確保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提升量度女童與婦女生活改善情況數據的質和量，以及建立更健全的問責機制，促使政府履行承諾。

### 未來願景

為對環球監察和問責作出貢獻，國際培幼會領導了一個夥伴合作聯盟，在未來15年量度與女童與婦女相關的全球目標的進度。該合作夥伴聯盟的目標，是創建一套獨立追蹤的方法（或稱「追蹤工具」），旨在成為倡議者、運動推動者、政府、公民社會合作夥伴和其他努力實現性別平等人士的主要資料來源。最終的目標是加快倡議運動，以推動政府兌現承諾。

這個合作夥伴聯盟的獨特之處，除了性別為特定焦點外，在於其匯聚了世界不同地區，不同領域擁有廣泛經驗與才能的人士。所選聯盟成員包括了基層人士以至私營界、合作夥伴與捐獻者，確保這項倡議可以成為敢言、獨立和代表全球的聲音。

此類多界別聯盟的重要性，在最終的2030年議程獲得肯定。議程呼籲「本著加強全球團結的精神，振興全球可持續發展夥伴關係。」<sup>12</sup>這種合作可以分享知識、專業才能和科技，也可動員財務資源以支持所有國家實現全球目標。

為確保追蹤工具可盡量在證據為本的倡議和決策上發揮作用，合作夥伴將研發各種報告、計分卡、數據可視化工具和其他為兩組主要受眾的需要而設計的材料，包括女童和婦女的公民社會運動與政府決策者。

選擇這些目標組別，乃因為女童和婦女的公民社會運動，特別是基層組織或網絡，是促請政府制訂改變女童與婦女命運政策的最有力倡議者。另一方面，政府決策者所制定的政策與投資會直接影響與女童與婦女相關的全球目標能否落實。

其他目標社群包括媒體、私營界與多邊組織，因為它們都是重要的合作夥伴，而且在確保平等與女童和婦女獲賦予權能機會上擁有共同責任。

兒童在哥倫比亞  
亞姆水。  
Mauricio  
González



由於了解到很多其他單位都具有實現全球目標的共同責任，合作夥伴將盡其所能，致力與更多持份者緊密合作，包括聯合國有關機構和各國政府，以確保各方努力可以相輔相成具一致性，並使用最相關和最新的數據。

為在聯合國官方數據監察工作方面更進一步，合作夥伴將根據原有的定質和感知數據，更全面地反映女童和婦女的實況。直接向女童與婦女提問將可配合統計學數據，就政府有否真正兌現承諾提供更充分證據。

在計劃的首階段，合作夥伴將發表需要追蹤的選定優先衡量指標，並說明為什麼在實現全球目標的年代裡，每一項衡量指標

在了解女童與婦女的現狀上都有其重要性。計劃並將進行分析，以決定有哪些官方數據可以用於追蹤優先衡量指標，以及哪些地方仍有待填補缺口。

追蹤工具旨在反映全球情況，但也將根據國家、地區與主題作深入探討。合作夥伴將發展聯合環球通訊和倡議的計劃，並將直接與選定國家的女童和婦女運動合作，以確保有關結果、見解和建議可以推動決策者與其他單位採取行動。我們並將確保那些有能力在全球、國家和當地層面推動正面和持久改變的人能夠獲得這些有說服力的數據。



## 創始合作夥伴簡介

如果各方的行動者攜手為同一目標努力，可以取得重大成果。以下組織已承諾在此重要倡議中協作。



partnering for a  
gender data revolution

**Data2X** 是聯合國基金會倡議的一項計劃，也是一個技術與倡議協作的平台，旨在改善性別數據的質素、可用性和使用，藉此為全球婦女與女童的生活帶來實際改變。Data2X 相信沒有數據平等便不會有性別平等，受到這個想法激勵，Data2X 與聯合國有關機構、政府、公民社會、學者和私營界一同努力消除性別數據缺口，提倡擴闊和不偏不倚的性別數據收集，和使用性別數據改善支持性別平等的政策、策略和決策。

Data2X 希望透過策略性政策倡議與技術合作夥伴的結盟，推動填補健康、教育、經濟機會、政治參與及人類安全這五大發展領域的數據缺口，從而改變性別數據如何被理解、收集和使用；因此，我們需要發動性別數據革命，務求追蹤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度，並最終實現有關目標。



**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

自 1984 年以來，**國際婦女健康聯盟 (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 已積極爭取改善女童和婦女在性與生育上的健康和權利，並於環球與當地社區的女童與婦女工作上取得政治勝利。國際婦女健康聯盟透過促進南半球國家婦女和年輕人與重要決策者之間的溝通，在當地實況與國際政策之間建立橋樑。國際婦女健康聯盟藉此把地區聲音帶到環球層面的辯論，從而令環球進程與政策在本地層面可以更容易被理解和可付諸行動。

國際婦女健康聯盟矢志幫助年輕婦女成為環球婦女運動的新倡導人。組織讓年輕的女性主義者得到向其政府和聯合國作有效倡導所需的工具與培訓。透過舉辦實用倡導工作坊，國際婦女健康聯盟支持來自 54 個國家的超過 200 名年輕倡議者成為倡議領袖。這些倡議者正在積極推動政策與為有效計劃籌募資金。



**畢馬威國際**在發展界別內已有悠久歷史，協助政府、商界和公民社會組織實現目標。作為向發展界別提供專業服務的領先供應商，該公司以其廣泛的跨行業專業知識，回應現今履行果敢方案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的挑戰。

在現今日趨複雜的環境中，畢馬威明白有關透明度、管治、問責性、風險管理、監察與評估、項目監督等各方的機會

與問題。憑藉旗下遍佈全球、有能力履行創新方案的專家網絡，畢馬威得以借助數據和分析改善決策，並發展出變遷準備度指數等多種工具，藉以推動策略性見解和行動。

畢馬威特別欣賞可以讓婦女與女童獲賦予權能上具改革性的影響。該公司參與公、私營界推動解決方案，並與合作夥伴攜手，建設更繁榮、更具抗逆力和更包容的世界。



**ONE** 是一個推動運動和倡議的組織，由世界各地超過 700 萬人以行動結束極端貧窮和可防治的疾病，特別是在非洲地區。不論是在首都城市游說政治領袖，還是舉辦前進的基層運動，ONE 的倡議工作透過向政府施壓，使其更努力在地球上最貧困的地方抗擊愛滋病和其他可以預防和治療的疾病、讓小農獲賦予權能機會、擴大使用能源的機會、打擊貪污，確保政府對市民負責，以結束極端貧窮為目標。

結束貧窮與結束性別不平等的抗爭是並肩同步的，因為以女童與婦女為焦點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足以讓所有人更快脫貧。意識到這些投資在結束極端貧窮上的重要性，ONE 的「貧窮是性別歧視」運動旨在促請各國領袖採納重要的政策與決定，把女童與婦女放在全球發展議程的中心。



**國際培幼會**一直致力建立爭取兒童權益和女童享有平等待遇的公義世界。超過 75 年來，組織一直為兒童建立強而有力的合作夥伴關係，現時活躍於全球超過 70 個國家。

國際培幼會與兒童、年輕人、支持者和合作夥伴一同努力，處理促成女童與所有弱勢兒童被歧視的根本原因。利用組織的接觸面、經驗和知識，國際培幼會的方針是在當地、全國和國際層面，在惠及兒童的作業方式和政策上推動改變。

透過研究、倡議和基層社區發展，國際培幼會宣揚兒童與年輕人權益，並讓他們做好準備，應對打擊和逆境。

透過組織的工作，國際培幼會力求重視女童，並停止對她們的不公義，讓她們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利。「愛·女孩」是該會現時最重要的環球倡議。這是一項由國際培幼會推動的運動，致力確保各地的女童都可以學習、領導、決定和茁壯成長。

## WOMEN DELIVER

**Women Deliver** 是一家具領導地位的環球倡議機構，主力推動女童和婦女健康、權利與身心健康。Women Deliver 透過匯聚多元聲音和利益催化行動，藉以加快進度，特別聚焦於孕產、性與生育健康和權利。

組織以具影響力的傳訊和倡議策略、可接觸世界具影響力的單位、參與重要的聯盟和計劃，以及為年輕人與公民社會建

立能力著稱。Women Deliver 以會議、倡議和傳訊工具等各種平台，提倡最佳的意念，重點提出有什麼可行、致力呼籲各界加入行動，讓公民社會做好準備，倡議在女童與婦女身上投放資源。





# 當我們在女童和婦女身上投放資源，所有人都是贏家

**WOMEN DELIVER 主席及行政總裁  
KATJA IVERSEN**

來自世界各地的證據證實了過去數十年經驗告訴我們：女童與婦女都是驅動發展的力量。給她們接受健康護理的機會，她們可以令家庭更能面對逆境；給她們學習與賺取收入的機會，她們可以令經濟更強健。只要給她們機會，她們便會交出各種解決方案。

我們知道把資源投放在女童與婦女身上，特別是在她們的性與生育健康和權利、教育，以及讓她們在經濟和政治上獲賦予權能，是讓社會整體進步的最聰明做法。

然而，即使鐵證如山，決策者卻一次又一次地忽視女性，也沒有把女童與婦女的工作放在優先位置。女性被排除於醫療服務外、在受教育上遇到阻礙、在性別暴力前無力抵抗，在爭取政府議席時、嘗試擁有資產又或尋求資金讓家庭走出貧窮時都備受歧視。

除了實質進展—包括縮小在教室中的性別差距和讓孕產婦死亡率有所降低—讓女童與婦女獲得真正平權的工作卻相形見绌。為什麼？部分原因來自缺乏數據和證據，以及以女童與婦女為焦點的撥款和政策。另一方面，也因為現有的倡議都在獨立推行，未能意識到問題本身橫跨不同範疇的特性。

要促進教育平等，特別是中學和大專教育，不能單靠在學校錄取更多女生；我們需要採取全面的方法，例如撤消學費、考慮安全問題與居住在偏遠地區學生上學的限制、確保校內備有按性別分隔的水和衛生設施、預防童婚、以及以教育質素為焦點，才可以讓女童完成學業後投入正規經濟。

我們需要消除獨斷獨行的想法，才可以令未來 15 年的發展工作以婦女的健康、權利和身心健康為焦點，而且以跨界別協作和整合為基礎。

## 為美好生活努力

自 2008 年以來，Women Deliver 一直協助推動和繼續倡導投資於女童與婦女身上，合作夥伴包括世界銀行、麥肯錫公司和其他單位。Women Deliver 在 2016 年 5 月舉行的第四屆環球會議，便以這個方針為焦點。Women Deliver 和合作夥伴於 2016 年的會議上推出 Deliver for Good，這項運動是全新的跨年運動，旨在清楚說明投資於女童與婦女身上的重要性。

在促進女童與婦女的健康、權利和身心健康工作上投放資源，不僅是人權角度上的正確一步，在經濟角度而言也是聰明的做法。政府與其他單位在政治上、程序上和財務上都需要在女童與婦女身上投放資源，因為那是我們在未來數十年間實現全球目標與獲取重大社會和經濟回報的方法。

我們可以仿效和採納很多正面的模式，如在贊比亞校園內興建水和衛生設施、<sup>13</sup> 在馬拉維結束童婚的工作，<sup>14</sup> 在尼日爾教育丈夫有關避孕的重要性，<sup>15</sup> 還有在柬埔寨改善助產護理<sup>16</sup>。

以上各項都是精明的投資，而數據在證實成效方面可謂舉足輕重。以家庭計劃服務為例，每花費一元便可以獲得高達 120 元的神益，<sup>17</sup> 如在性與生育健康投資，令更多人可以選用避孕措施，不但有益婦女身心健康，亦具成本效益。

擁有平等產權和繼承遺產權的婦女，較沒有這些權利的婦女多賺近四倍收入。<sup>18</sup> 投資於婦女的土地保有和財產權利是另一項有效的長遠方案，能加快經濟賦權與消除貧窮。

另一項可以在各方面加快進度的投資，是支持公民登記與重要統計：數據蒐集與數據管理。女童與婦女有其重要性，因此我們需要把她們計算在內。

在很大程度上，現有數據與統計無法恰當地納入女童與婦女。我們必須消除性別數據差距，才可以幫助揭示在女童與婦女上投資的需要和由此得到的機會。沒有可靠的數據，決定只可能建基於錯誤的資料。可靠的數據能增加女童和婦女生活的可視度，以提出更有效的計劃和政策。公民社會掌握到可靠數據，便可以促使政府和其他具影響力的機構對這方面負責。

女童與婦女是有力的改變者。面對前路的重重大挑戰，世界不可以再對她們視若無睹。我們必須把女性計算入內，在各項發展上算她們一份。她們的聲音需要響徹家庭、社區、社會和權力廳。

婦女肩負的不只嬰兒或水，她們肩負家庭、商業活動和社區，並擁有潛能和解決方案，當我們把女性計算在內，並在她們的健康、權利與身心健康上投放資源，她們便可以撐起整個國家，惠及所有人。■

## 第二章

# 隱形的女童 隱形的婦女



緬甸的學生學習如何應對災難和緩和氣候轉變的風險。  
國際培幼會



## 因為缺乏可信和適時的數據，數以百萬計的女童被隱形。

對很多人來說，只要簡單地一掃、一點或按鍵，便能找到很多有用的資料，包括我們是誰、住在哪裡、我們可以享受哪些產品、服務和經驗，還有關於健康或安全、可以救人一命的資料。

廣泛使用科技，不論是好是壞，為個人、公司和政府記錄、收集、儲存和分析資料的方式帶來了巨大改變，影響之大，令很多人認為我們正經歷一次資訊革命。

但是這場革命並沒有平等地觸及所有人，數以百萬計的人繼續被隱形，全因缺乏可信與適時的數據。女童與婦女是最不為人察覺的一群，因為現時收集的數據無法準確反映她們所面對的具體挑戰，而其他與她們生活相關的數據根本未被收集。

例如，我們可能知道有多少女童在上學，但是我們卻沒有充分地統計有多少女童因為婚姻、懷孕、性暴力、學費等各項原因而失學，或在完成學業後缺乏就業機會。如果我們沒有追蹤一些限制她們機會的最重要因素，又如何能增加每一個女童接受教育的機會？

很多國家沒有任何關於女童和婦女面對貧窮的經驗和貧窮脆弱性的資料。<sup>21</sup> 雖然超過一半國家有匯報關於親密伴侶暴力侵害的數據，<sup>22</sup> 但這些數據在質素與定義上的差異令我們難以就這些結果作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在 2005 至 2014 年間，最少有兩段時期只有少於一半的發展中國家有按性別分類的失業、勞動參與、就業情況，以及按職業分類的就業數據。<sup>23</sup>

我們的知識中還有不少其他缺口。我們對於婦女可以接觸的社會保障只有很少資料。我們只有很少量度婦女工作質素與數量的數據，不論工作是有償還是無償、正式還是非正式。很多國家仍然不能準確確定女童在哪裡和什麼時候出生；她們在哪裡上學、在學時間有多長；女童與婦女工時有多少、她們有否在工作上獲得薪金；她們曾否經歷暴力；以及她們如何、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死亡。

在 2000 至 2015 年間，即千禧發展目標實行期間，任何五年期內需要追蹤核心衡量指標的應有數據，最多只有 70% 可用。<sup>24</sup> 缺乏優質資料往往引致不良的規劃、決策和資源分配。

全球目標讓我們有潛力做得更好。但是我們首先需要回應兩個基本問題：填補數據不存在的缺口和改善部分現有數據的質素。

## 為性別數據定義

「性別數據」一詞指足以反映女童、男童、婦女和男人的差異和不平等的數據。性別數據可以為造福整個社會的政策與計劃提供實證，包括：

- 按性別和年齡分類的數據
- 反映性別問題和不平等的數據
- 凸顯女童、男童、婦女和男人生活中的實況與多元性的數據
- 以造成分類和收集上產生性別偏見的方法和概念所收集到的數據。<sup>19</sup>

大部分官方資料來源都只收集年齡介乎 15 至 49 歲的女童與婦女數據，因此，我們對於那些在低至中收入國家、每年由 15 歲以下女童誕下的 200 萬名兒童所知甚少。<sup>20</sup> 決策者眼中幾乎看不見年輕母親。如果連官方數據都忽視她們的存在，我們又怎能瞭解她們的生活和應對兒童懷孕的問題？

## 分類的需要

分類數據，即把資料細分成較小的子集，是發掘各組別之間的差異和不平等的重要方法。舉例來說，把錄取、入讀和完成不同年級課程的兒童數字按年齡和性別進行分類，<sup>25</sup> 可以反映女童與男童在不同生命階段是否有重大差距。

在分辨和回應人們在生命週期中面對的個別挑戰，年齡分類尤為重要。舉例來說，住戶調查把「生育年齡」界定為 15 至 49 歲，但是對於很多女童與男童而言，他們的性生活活躍和生育階段早於 15 歲以前開始，而且超越 49 歲。要瞭解往往被隱形的社群狀況，衡量指標必需要包括較年輕的青少年和 49 歲以上的婦女。

分類數據在女童與婦女面對獨有風險和脆弱性的人道環境中特別有用。可是，在 2013 年檢討中發現人道主義界別的 11 所有關機構中，所採用的 1,680 個監察和評估衡量指標，只有 2% 按性別分類。<sup>26</sup>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按性別與年齡分類的數據能在緊急情況中發揮重大作用。這種資料在識別保障差異、恰當地設計和針對介入和評估回應上十分重要。但是收集可靠的分類數據需要動用的資源，很多時候都被優先分配予其他人道主義救援工作。

不論是在發展還是在緊急情況中，分類必須超越年齡與性別，因為人們不會屬同質組群，而且籠統的資料可以非常誤導。按其他特徵收集分類數據，例如種族、宗教、身體殘障、地點、婚姻狀況、財富、性取向與性別身份等，可以就性別和年齡與其他特徵互相影響的分析更加細緻，而這些特徵有時候正是令女童與婦女處於多重弱勢的原因。

對某些組別的人來說，多種和重疊的不平等情況所致的系統性社會排斥，嚴重地限制了他們在生命中的機會。當有些人被視為較低等或其價值比不上其他人時，當人們住的地方難以到達或易受忽視時，當他們因為不能平等得到資產和機會而處於弱勢時，或當他們被拒絕就影響他們生活的問題發聲時，排斥便會出現。<sup>27</sup> 雖然這些不公義會有其後果，但當這些不公義互相重疊和交錯，所產生的社會排斥便會變得更難克服。

沒有分類數據，便不可能知道《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目標能否實現。儘管目標 17 提出了明確的目標，要求按收入、性別、年齡、種族、族裔、移居狀況、身體殘障、地理位置和其他相關特徵把數據分類，但卻未有明確提出達至這個目標的方法。

### 追蹤與女童和婦女相關的全球目標的進度

組成審視邁向全球目標進度基礎的 231 個衡量指標，被稱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最後缺少的一塊」。然而，要令這些衡量指標能夠真正量度政策、策略與作業方式的影響，特別是對最被排斥的一群，還有很多工作尚待進行。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標機構間聯合專家組（Inter-Agency and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ndicators）把這些衡量指標分成三層，指出這些衡量指標是否在概念上清晰、已有既定的方法和可用標準，以及具備由國家定期產生的數據：

- 在第一層，已具備成熟／完善的方法和標準，並已有可用數據。
- 在第二層，已具備成熟／完善的方法與標準，但是數據非常零散。
- 在第三層，需要完善方法以制定衡量指標，而且沒有可用數據。

完成衡量指標框架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第一層的衡量指標只佔 40%，50 項衡量指標被分類到第二層。第三層包括 78 項衡量指標，在可以使用前仍需要進一步工作，另外有 15 項衡量指標未被分配入任何一層。<sup>28</sup>

框架應隨著時間演變和提升，而最迫切的任務是聚焦於現時無法被充分量度的衡量指標。明白官方衡量指標並非完全足夠這一點也非常重要。額外衡量指標，即使它們不被視為官方正式資料，在瞭解以女童與婦女優先目標的進度上也十分重要。

雖然所有官方衡量指標都在某程度上與女童與婦女相關，有一些較具體適用，例如由受訓練醫護人員接生的比例。這項衡量指標被視為第一層，因為所有地區均廣泛具備相關數據，超過 150 個國家在 2010 年至現今均有匯報。這項衡量指標已有既定的方法，而且已被測試和具有商定的國際標準，雖然現時仍在推行工作，以為「熟練接生員」一詞制訂各方同意的定義，令其得以在不同的數據來源中使用。

其他對女童與婦女重要的衡量指標表現較差。目標 5.1 呼籲「在全球消除對婦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視」。然而，選定量度這個目標的衡量指標：「有否根據性別，就推動、執行和監察平等與非歧視制訂法律框架」被分類至第三層。換言之，我們現時並沒有方法可以正式地量度對女童與婦女的歧視有否減少。

為列舉部分將要處理的工作，下頁的表格羅列了十個與女童與婦女相關的優先目標和衡量指標的情況。



## 如何量度女童與婦女工作的進度

衡量指標	狀況
<b>第一層：已具備全面發展的方法和標準，並已有可用數據</b>	
獲社會保障標準／制度覆蓋的人口比例，按性別分類，並區分兒童、失業人士、長者、殘疾人士、孕婦、初生嬰兒、工傷受害人和貧窮及弱勢社群（1.3.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已測試既有方法，並具備國際標準。然而，每個國家的可用數據因為福利受益人的種類而有所不同，例如：兒童，109 個國家；失業，79 個國家；殘障，171 個國家；老齡，175 個國家；孕婦，139 個國家；工傷受害人，172 個國家。</li> <li>● 需進一步發展「貧窮和弱勢」定義的明確概念。</li> </ul>
介乎 15 至 49 歲的生育年齡而獲得可滿足其家庭計劃需要之現代方法的婦女比例（3.7.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具備既有方法和已經測試，並已有國際標準。現正根據統計學模型把此衡量指標的估計和預測數字覆蓋範圍擴闊，由只包括已婚或有結合關係的生育年齡婦女延伸至所有婦女，不論她們是否已婚或有結合關係。</li> <li>● 90 個國家具備調查數據；所有國家將可提供模式化數據。</li> </ul>
10 至 14 歲或 15 至 19 歲的年齡組別中，每 1,000 名婦女的青少年生育率（3.7.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現有數據僅覆蓋 15 至 19 歲的青少年，雖然廣泛地區都具備這個年齡組別的數據。</li> <li>● 估計 15 歲以下女童生育率的方法正在研發中。</li> </ul>
<b>第二層：已發展方法與標準，但是數據非常零散</b>	
15 歲或以上曾經有伴侶，並曾於過去 12 個月內遭現時或前度親密伴侶在身體、性或心理暴力對待的婦女與女童比例，按暴力形式和年齡分類（5.2.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很多國家都沒有關於親密伴侶暴力的數據，而在有這項數據的國家中，數據不一定可以互相比較。按年齡和暴力形式分類的數據可以很容易獲得，但是要包括根據其他特徵分類（例如身體殘障或族裔）的數據可能較有難度。</li> <li>● 到目前為止，只有約 40 個國家曾就調查婦女受暴力對待進行過一次以上的調查。</li> </ul>
在過去 12 個月，曾受非親密伴侶性暴力對待的 15 歲或以上婦女與女童比例，按年齡和發生地點分類（5.2.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大部分已有的婦女受暴力對待調查只記錄了性暴力某幾方面的資料。婦女受非伴侶性暴力對待，通常被定義為強迫某位不同意的女性進行性交，以及嘗試強迫某位女性進行性交或違反其意願的性行為。</li> <li>● 性暴力的其他重要範圍，例如性騷擾、嘗試作出不同意的撫摸、愛撫、強抱或親吻，和猥褻露體，都較少作廣泛記錄和量度。</li> </ul>
女性與男性僱員的平均時薪，按職業、年齡與殘疾人士分類（8.5.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有 66 個國家有定期的可用數據，但是很多其他國家沒有定期報告。某些國家並沒有任何可靠的來源可作報告，應該做的工作是著力估算數據。</li> <li>● 性別薪金差距只按受薪僱員計算，因為一般都有可用的員工收入數據。因此，性別薪金差距沒有涵蓋大量自僱工人或僱主 — 特別是在非正規行業，男性與女性的收入差距可能更大。</li> <li>● 性別薪金差距也沒有掌握因接觸有償就業機會不均所致的男、女性收入差異。</li> </ul>
<b>第三層：需要就方法努力；沒有可用數據</b>	
兒童與年輕人的比例：(a) 就讀二或三年級、(b) 在小學階段結束時，以及 (c) 在初中階段結束時，最少在 (i) 閱讀和 (ii) 數學達致最基本的熟練程度，按性別分類（4.1.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已制定及測試一套方法，但是現時沒有商定的國際標準，儘管正就開發標準進行相關工作。</li> </ul>
有否根據性別，就推動、執行和監察平等與非歧視制訂法律框架（5.1.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就開發及測試一套方法、開發商定國際標準的工作正進行中。</li> </ul>
已制定法規保證年齡介乎 15 至 49 歲的婦女得到性與生育健康護理、資料和教育的國家數目（5.6.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儘管已有建議方法，但卻未經測試。現時沒有商定的國際標準，但開發工作正進行中。</li> </ul>
過去 12 個月內，身體或性騷擾受害人的比例，按性別、年齡、身體殘障狀況和發生地點分類（11.7.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儘管現時透過暴力與受害者的專門調查，在量度身體與性暴力已有商定的國際標準，但現時沒有量度身體與性騷擾的商定國際標準。</li> <li>● 現時沒有量度騷擾的可用數據。</li> </ul>



# 劣質數據是否比沒有數據更差？

作者：DATA2X 資深研究員  
MAYRA BUVINIC 及聯席主席 RUTH  
LEVINE

某些形式的性別偏見可以見於我們量度、或無法量度人們生活面貌的方法。在很多針對《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的發展成果中，關於現有情況的資料並沒有根據性別分類，排除了瞭解性別差異的任何可能性。在其他情況中，性別偏見在量度過程裡根深柢固。這些量度挑戰可以稱為「無數據」或「劣質數據」。

## 我們未有掌握的數據

缺乏關於女童和婦女生活的資料，是我們在應用性別數據量度各項全球目標成果時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例如目標 16 提及和平和包容社會的重要性，而且制訂了確保各級「決策反應迅速、具有包容性、參與性和代表性」的目標。<sup>29</sup> 但是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沒有量度男性與女性參與公民社會組織或本地諮詢委員會、決策機關差異的數據來源。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表明如果數據可以讓我們看出女性和男性經歷之間的分別，我們就現有狀況與進度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理解。

缺乏數據，特別是有關女童與婦女生活的議題上可以為政策與計劃的設計帶來嚴重後果。例如，有人認為家庭主婦有空間時間接受培訓及其發展機會，但這是因為有關無償家務工作的數據十分有限。很多計劃例子都根據這個錯誤前提設計，因而出現女性參與者高退出率的結果。<sup>30</sup>

為判定缺失數據的範圍，Data2X 就截至 2013 年未有計及女童和婦女生活在內的數據，審視和定出 28 個環球的與政策相關領域（結果請見附表）。

## 劣質數據對比優質數據

沒有數據已經夠壞，因為這樣會迫使在缺乏重要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政策決定。但是不符合標準的數據往往更危險，特別是當數據系統地歪曲事實，令婦女比實情看似更具依賴性和不事生產。

調查很多時候都以複製傳統性別社會規範的方式設計，進一步矮化了婦女在家庭與經濟生活的角色。例如，很多社會經濟與農業的住戶調查，都以（男性）戶主作為住戶支柱的角度來建構，而其他家庭成員都根據與這位（男性）戶主的關係被定義。很多調查指示都明確表明假設男性大都為戶主的看法，而統計員和受訪人士也持有這個觀點，令擔任此角色的婦女被漏報。

如果女性主導的住戶被低估，這些住戶可能在分配生產力資源時被忽視，因而可能較少獲得來自對抗貧窮計劃的福利，特別是那些旨在接觸戶主的計劃。例如世界銀行一個涵蓋六個國家、佔非洲撒哈拉以南超過四成人口的鄉郊數據庫，顯示女性為首的農耕住戶會比男性為首的較少獲得肥料和其他農業投入，在過去一年較少獲得信貸，也較少有土地權和擁有屬於自己的農地。<sup>31</sup>

勞動力調查也可以鞏固男養家糊口、女管家的性別角色定型。這些調查很多時候只就個人的主要經濟活動提問。這個做法大大低估了婦女的經濟貢獻，因為很多時候，她們的有償工作為副業，以「家庭主婦」作為主要角色。結果，依賴這些調查的決策者對婦女如何為經濟增值瞭解甚少。

與婦女和女童相關的「劣質數據」或「無數據」，阻礙了政策影響、進度追蹤和要求問責的能力。





來自敘利亞的難民 Mais，在埃及亞歷山大港一個兒童天地玩耍。  
國際培幼會 / Hassan Amin

重要的是，女童與婦女的優質證據因為質素良好，所以可信、有力而具代表性，而且不存在性別偏見。優質證據也擁有良好的覆蓋性，能夠代表整個國家，國家亦會定期提供相關數據，也可以在概念、定義和量度上進行國與國之間的比較。

優質證據有兩個主要的理想特徵：「複雜性」指的是來自女童和婦女生活不同領域的數據，例如健康和就業，可以互相參照與交叉分析；而「精細性」指數據可以再細分成較小的單位，例如按種族和族裔、年齡和地理位置以及性別分類。

## 機會

與婦女和女童相關的「劣質數據」或「無數據」，阻礙了政策影響、進度追蹤和要求問責的能力。數據放諸爭取女童和婦女權益的倡議者手上，可以是極具力量的工具。教育和性與生育健康是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取得最顯著進步的地方，這兩個範疇都具備更佳的數據。

與此同時，在沒有數據的無償工作領域，或數據較差的經濟參與領域，進度較差。

我們在提倡改善女童與婦女命運的政治主張時，都需要在歷史上沒有性別數據的範圍裡，得到針對性別的資料，例如工作、人身安全和自由、防範環境傷害的保障，以及健康與教育方面較常具備的資料。

這些絕非唾手可得的數據，但都是實現全球目標所不可或缺的。■

註：本文內容改寫節錄自一份於 2016 年 4 月在《Significance》雜誌刊登的文章。

### 第三章

# 數據的作用和限制



Fuseima從加納西北地區的河  
打水後攜水回家。  
國際培幼會 / Nyani Quarmyne



明智地使用數據是解釋世界特別有效的方法，但是也有很多限制和挑戰。

**單憑數據並不可以改變世界。**具備優質性別數據和分析，可以幫助政府、私營界和公民社會倡導與實施對性別具改革作用的政策與計劃，並量度效率。但是單單擁有這些資料不會自動地引發更佳的政策和選擇更好的計劃，或更有效地推行。顯然，制訂政策除了缺乏資料，也面對其他限制，包括但不限於缺乏政治意願和牢固的性別和社會規範。

然而，數據分析卻可以透過反映深入見解、辨識需要和測量什麼可行和不可行，帶出能成為決策和改變進程理據的知識。具有質素、相關性和適時的數據，也可為公民社會提供挑戰政府與其他決策者優先次序或行動的所需證據，還可以發出警號和要求更多或更快的行動。

當一個問題只有很少的證據可以證明它如何普遍，或如何深深影響人，要對其忽略便相對較易。因此，在女童和婦女的生活實況上擁有準確、相關的定量和定質數據便非常重要。

數據能夠說故事，因為每一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是真人真事。我們必須更努力地記錄、聆聽和回應那些故事，以及善用它們來確保最被排斥的不再被遺忘。

**有缺陷的數據收集與分析可引致有漏洞的結論。**有時候即使有最良好的意願，數據結果都可以因為數據偏差或那些收集和分析數據的人員有偏見而被扭曲。優質性別數據確保在收集與分析數據時，在概念、定義和方法上都可以準確反映真實的生活和盡可能避免偏見。

其中一個因為調查設計導致結果出現偏頗的例子，是住戶調查通常會向其中一位成員提出，這位成員「戶主」負責為整個住戶和在那裡居住的個人回答問題。

在很多情況下，調查都會自動假設這人是男性而非女性，且年紀較大。但是在某些情況下，男性對於女性每日的真實生活情況所知甚少，反之亦然，所以回應不一定能夠反映整體實況。

獨立地訪問一個住戶的所有成員，當然會有龐大的後勤和成本影響。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其他方法避免性別偏見，例如在有強烈性別偏見的問題上確保訪問員和受訪者屬於相同性別。

即使以「住戶」一詞作為量度單位，概括地定義為一個有關係或沒有關係而住在同一屋簷下的群組，也對收集優質性別數據造成挑戰。女性為首的住戶和複雜的家庭結構，例如非正式或一夫多妻的婚姻，還有關於婦女有否同等地參與家中資源分配決定的問題，包括她們本身的收入和遺產繼承，都可能是模糊不清。此外，住戶調查很多時候並不包括住在「典型」住戶以外的人，也不包括無家可歸和流離失所的人。

相同的脈絡下，勞動力調查往往掙扎於蒐集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家居生活，和參與工作和社交活動上的不同角色和期望。如何為「具生產力」的勞動作定義或理解，可能會促成婦女的經濟貢獻被忽視或沒有被計算。儘管煮食，清潔，照顧兒童，病人和老人，家務或社區義工工作上所花的時間難以量度，但這些活動應被視為有生產力的勞動，並在作出政策決定時納入考慮因素。

**數據必須在其所存在的環境中表達。**只靠數字並不可能反映整個故事。如果定質與定量衡量指標並沒有以綜合全面的方法進行分析，女童和婦女的生活實況便可能被掩蓋。

例如，某個城市可能收錄了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女童人數數據，卻可能沒有關於女童認為使用那種交通是否安全的數據。如果女童對於乘搭巴士或前往乘巴士的步行路程不感到安全，可以使用公共交通的女童人數便沒有太大實質意義。

同樣地，使用時間的調查可以透過顯示人們分配時間的差異，補充勞工調查。這些調查請受訪者報告他們在某指定時間的所有活動，以及他們在每一項活動上所花的時間。這樣可以反映多項重要資訊，包括無償和有償工作、工作生活平衡、個人投放在教育與健康上的時間，以及在住戶內和住戶之間可能出現不平等情況的地方。

# 調查設計的重要性

2010年在坦桑尼亞進行的一項實驗顯示，提問方式及受訪對象能夠影響統計結果

當被問及簡單的問題：「你在過去七天有沒有做任何工作，即使只有一小時？」，婦女傾向回應較低的就業水平。但是當她們被問到關於多項被視為「工作」活動的更詳細問題時，她們所報告的就業水平較高。

由誰來回答問題也對結果有一定影響。要求男性匯報自己的主要活動時，他們所回答的就業水平會較由住戶中其他人代他們回答的高。<sup>32</sup>

同樣地，在烏干達使用詳細的篩選問題時，可以更有效地記錄較廣泛的經濟參與。

在一項 1992 至 1993 年的調查中，受訪者可以選擇記錄他們的主要就業狀況為「不活躍」，原因可以是「家務」、「學生」或「因為太老或太年輕而不適合工作」。很多將其主要就業狀況歸類為參與「非經濟」活動的人士，也在副業情況中報告了經濟活動。很多事實上經濟活躍的人認為這類經濟活動的地位次於他們所參與的其他非經濟活動，例如上學或照顧家庭成員，因而把自己錯誤分類到「不活躍」和不屬於勞動力一部分。

擴大分析以涵蓋次要活動，令烏干達的適齡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78% 提高至 87%，差異涉及超過 700,000 人。<sup>33</sup>

## 數據與人權

在推動增加知識和資料，以為決策提供理據的工作上，必須時刻注意大部分數據都是關於人的事實，而所有人都擁有權利。

就算在我們奮力應對官方數據中的巨大缺口時，越來越多的數據產生自「被動」的來源，它們很多時都是在與使用者沒有明顯的互動下收集。主要與使用智能電話和互聯網等數碼科技相關，以這種方法收集得來的資料，可以包括使用者的所在地、他們在一個網頁上所花的時間、他們安裝了哪些應用程式、他們追蹤哪些連結等等。

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地收集，如果關於使用者身在何方、一舉一動、喜愛的、不喜愛的、社交互動、健康狀況、性取向或性別身份的數據被惡意公開，都可以令人陷於風險。傷害可以無心造成，但是也會引起公眾尷尬、社交孤立、歧視、安全隱憂或其他更惡劣的後果。

雖然我們必須在個人權利與社會益處之間取得平衡，要令人們輕鬆自願地提供關於自己的數據以用於惠及社會的地方，例如追蹤疾病模式或反映社會上不平等的情況，便需要給予他們高度的信任和責任感。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數據收集和使用的辦法，<sup>34</sup> 以下為確保數據改革堅守人權的重要原則。

**參與：**所有數據收集的工作都應該讓相關持份者自由、主動和有意義地參與，特別要關注最弱勢和最被排斥的人群。參與性的方法能提升數據收集與分析的相關性和可靠性。

**分類：**把數據細分為較小的子集，讓不同人口組別可進行比較，從而揭示可能出現的不平等和歧視的程度。缺乏分類數據可能會掩蓋背後的差異。分類數據的公佈方式，應該可以容許偵測多重與交錯差異和歧視。

**自我認同：**尊重與保護個人身份是人類尊嚴和人權的核心。「不要造成傷害」這個人權最大原則應在任何時候適用，包括在收集數據和分析數據時。人口普查、人口調查和基本統計不應該製造或加大現時已存在對個別人口群組的歧視、偏見或定型，包括拒絕承認他們的身份。





兒童在烏干達北部的兒童難民中心內盪鞦韆。  
國際培幼會

**透明度：**統計在民主社會中擔任主要的角色，尊重人口享用公開資料的權利，並為政府和商界提供資源。<sup>35</sup> 數據應該在收集後盡快發佈。分發時應使用容易理解的語言和形式，並應考慮到身體殘障、語言、讀寫能力、文化背景和人口的其他特徵。公民社會應可以發表和分析統計而無需害怕被報復。另外，為保持公信力，提問方式及受訪對象能夠影響統計結果。

**私隱：**在資料查閱與私隱權利和數據保障之間必須取得平衡。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族裔、性取向、性別身份或健康狀況的資料，應該在得到有關人士的同意下才作處理。收集供製作統計學資料的數據必須嚴格保密及僅應用於統計用途，並應受法例規管。數據不應該以可以直接或間接辨認個人身份的方式公佈或讓公眾查閱。數據應該獲得適當保護，免受天然和人為危機影響。不再需要時，應把數據刪除。

**問責：**不受政治干預的獨立統計，是為掌權人士提供資料，並向他們問責的基本工具。把收集到的數據交回市民手上，加強他們使用數據的能力，在問責上必不可少。

## 以數據加快運動進程

優質數據與分析得到的資訊，令政府得以使用以決定哪些問題需緊急處理。它們也為倡議者提供強大基礎，用以影響和勸諫決策者在針對被忽視的問題採取行動。

例如，多年共同游說促使太平洋小島國吉里巴斯共和國的政府，在 2008 年進行首項有關婦女和兒童被暴力對待的研究。在這項研究以前，性暴力被視為應該私下解決的問題。該國當時並沒有制訂與侵害女童與婦女的暴力、性別平等或婦女狀況相關的政策或法例，而且處理婦女受暴力對待個案的警務程序也缺乏清晰度和問責性。<sup>36</sup>

研究結果於 2010 年公佈，顯示吉里巴斯共和國的有關問題已到達令人震驚的程度：近 70% 曾經有伴侶的婦女表示自己是被親密伴侶以身體及／或性暴力對待的受害人。<sup>37</sup> 結果公佈時，政府深表關注，並呼籲全國人民挑戰當時的普遍想法：家暴在關上的門後發生，應接受它是生命的一部分。

這項新資料讓該國政府、公民社會組織、聯合國有關機構和國際捐獻者得到所需的動力，開始策動一些重要的法律和社會改革。

2012年，該國政府通過《家庭暴力和平法案》（Family Peace Act for Domestic Violence），並為警員、校方、輔導員、醫療和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培訓以推行有關法案；該國並革新了國家教育課程，教導兒童關於互相尊重、性別平等和預防暴力的資訊；教師學習如何輔導曾遭受暴力對待的學生。公民社會邀請男人和男童一同倡議反性別暴力。

結果，倡議者表示大眾對於針對女童與婦女暴力的情況認知有所提升。性與性別暴力的倖存者得到免費的服務支援，包括一條24小時熱線，而警方則設立了處理家暴與促進更安全社區的部門。<sup>38</sup> 由這個例子可見，數據可以是推動政策改革的重大力量。



在北方邦，Mahesh抱着他的女兒Mohini，該地區的女童對男童比例屬全印度最低。  
荷蘭國際培幼會

數據也有助揭示和應對由於根深蒂固的態度和信仰而產生的問題。例如在印度，2011年的人口普查便顯示相對於上一次普查，新生至六歲組別的男女童比例需要警覺。每1,000名男童出生，只有919名女童。<sup>39</sup> 在某些州份，比例更低至846名女童對1,000名男童。<sup>40</sup>

由印度國際培幼會與其他女童權益運動支持機構舉辦的「讓女孩出生」（Let Girls Be Born）運動，以這些數字挑戰由於性別偏見而產生性別選擇，並支持家庭和社區，以確保她們的女童能夠生存和茁壯成長。

三年來，運動惠及了12個女童對男童比例最低地區約120萬人口。<sup>41</sup> 運動鼓勵村民慶賀女童的誕生，來自貧窮家庭的女童獲得獎學金資助，社區組織亦舉辦街頭劇、集會、辯論、海報比賽和互動討論。

出生登記數字上升、女童權益關注增加、更多女孩上學和完成學業，還有對進行性別選擇墮胎診所提出起訴的數字增加，都顯示了運動的成效。



## 結束危地馬拉的童婚問題



不久前，危地馬拉女孩到了 14 歲，得到家長或法官的同意，便可以合法結婚。這項法律條文連同貧窮、性別歧視和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令每年出現數以千計的童婚個案。

童婚從根本上侵犯了女童的權利，也阻礙了社會發展，因為它剝奪了女童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潛力和創意。兒童新娘很多時都被孤立，依賴丈夫，少有得到醫療和教育的機會，也難以獲得免受暴力與虐待的保障。

危地馬拉國際培幼會透過旗下「愛·女孩」行動，聯同多所合作夥伴爭取修改法例，提高男、女童的最低婚齡。

高質量的數據在倡議策略中擔演重要角色。公民社會提倡引用有關童婚普遍情況和其影響兒

童生活的證據，並分析傳統瑪雅法例，成功地影響了立法者和減低反對改革的力量。國會最終於 2015 年 8 月修例，把女童與男童的最低結婚年齡提高至 18 歲。

女童是倡議改革中的重要推動者，地位不可或缺。來自卡爾查市的年輕倡議者 Mayra 表示：「當我聽到他們通過新法例，我感到非常快樂，因為我有份令事情成真。我收集了很多簽名，是努力推動這項改革的一員，我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 Mayra 和其他倡議者承認，修例只是推動改革的一個開始，未來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們仍然需要採用數據、證據和倡議來量度進度、提高國民對法律的認識和推翻傳統觀念，才可確保童婚真正成為歷史。

來自卡爾查市的年輕倡議者爭取提高危地馬拉的法定結婚年齡。  
國際培幼會



# 貧窮是性別歧視；全球目標不應如此

作者：ONE CAMPAIGN 環球政策總監 ELOISE TODD

2014年，我們開始發現 ONE 有參與的所有重要政策範圍，包括農業、健康、營養和經濟發展。婦女與女童最受貧窮影響。這項發現得到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這些證據來自研究和 ONE 在非洲親眼所見。

2015年，我們展開了「貧窮是性別歧視」運動並發佈首份相關報告，<sup>42</sup> 提出最貧窮國家的婦女與女童最受貧窮影響，但是當我們有策略地投資於婦女與女童，所有人都可以更快地脫貧。

ONE 是一個環球運動和倡議組織，擁有超過 700 萬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員，我們致力於採取行動，以結束極端貧窮和可防範的疾病，特別是在非洲。我們游說政治領袖並舉辦基層運動，務求促使決策者更努力地在地球上最貧困的地方對抗愛滋病和其他可預防及可治療的疾病，讓小農獲賦權能，擴大人們使用能源的機會，並打擊貪污，讓政府對其市民負責。

正如我們屢次親睹，有效的倡議建立於堅實的政策要求，這些要求來自清楚指出所需改變，並得到證據支持。優質數據在找出最需要改變和投資可以產生最大效果的地方上很重要。在優質數據的

**優質數據在顯示政府沒有為市民履行承諾方面不可或缺。**

基礎上建立倡議可以為我們的論述提供證據基礎，更理想的是，證明我們倡議的政策和投資能夠取得成效。

## 零散數據的挑戰

我們知道貧窮是性別歧視。世界各地的女童與婦女被忽視，而 ONE 相信除非努力帶她們在一起，否則所有人的發展成果都會停滯不前。然而，在某些地方，只有零星數據支持這些主張。

首份《貧窮是性別歧視》報告於 2015 年發表，其中列出了女童與婦女必須成為終結極端貧窮運動中心的論據。報告呼籲發展議程重新設定焦點，把女童與婦女放在中心位置，和更對準地把資源投放在讓世界各地的女童與婦女獲賦予權能機會，讓她們自己及其家人能夠脫貧。

報告審視了低收入國家婦女在不同範疇中面對的挑戰與機會，包括農業、健康與教育；經濟、法律與經濟賦權；還有使用能源與科技的機會。在整理報告的時候，我們在尋找規模足以反映世界各地婦女生活現況的數據集時，遇到極大的困難。在尋找顯示婦女因受惠於獲得更多資源而衍生機會的相關資料上，同樣是困難重重。

例如，當我們研究在發展中國家增加婦女使用能源的機會可帶來哪些潛在優勢時，ONE 引用了一項 2007 年的南非個案研究。該研究發現得到供電後，婦女就業率增加 9.5%。<sup>43</sup>

然而，這項南非研究並沒有就電力對這些婦女的生活產生的影響收集數據，也沒有大型數據是關於低收入國家婦女獲得電力後的影響。要更全面呈現和更恰當地了解電力供應和就業提升的關係，我們需要

更大的數據集，裡面應包括地理和家庭包容的度量資料。

2016 年的《貧窮是性別歧視》包括了一個指數，這是 ONE 嘗試用於找出女性最受苛待剝削的地方。<sup>44</sup> 我們制訂這個指數時審視了多種衡量指標，並考慮到女孩在一生中可能面對的最大威脅和機會。

指數並不旨在全面。事實上，因為缺乏可用數據，要為它找到七個衡量指標是一項重大挑戰。我們選擇的衡量指標可以充當合理的指引，從女童的健康和營養、教育和經濟機會，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了解她一生中的機會。

然而，這些衡量指標其中一個具決定性的重大因素，就是數據的可用性。獲選的衡量指標都有最廣泛的可用數據，但是它們不普及，以及在最後分析時需要考慮數據缺口。

其他組織也面對類似的挑戰。Bread for the World 的 2015 年《饑餓報告》(Hunger Report) 探討了聯合國 2013 年制訂的最低要求的性別衡量指標，該衡量指標是為指引各國製作性別統計而設。報告發現，在 1990 至 2013 年間，52 個定量衡量指標中，有過半只在每個國家平均採用了少於一個數據點。<sup>45</sup>

## 優質數據促成有效倡議

ONE 相信優質數據是有力倡議的基石，這個信念推動「貧窮是性別歧視」運動加速發展。優質數據不僅需要找出問題所在，也需找到進度差距存在的地方，而且需要準確地向捐獻者展現他們的投資可以帶來的潛在影響。





在顯示政府未有為人民履行職責，特別是婦女與女童方面，優質數據同樣不可或缺。尼日爾、索馬里、馬里、中非共和國、也門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婦女都應該知道這項資料。根據我們的指數，這六個國家都是女性最受苛待剝削的地方。把優質數據交到婦女、倡議者和這些國家領袖手上，可以讓他們向政府提出強而有力的論據，爭取更佳的服務和支持。

不論是低或高收入國家，數據也為公民社會組織提供支持，使其能夠更有力地促使各國政府負起應有責任，在所有發展領域中交出成果和顯示進度。

要解決性別歧視數據危機，我們需要盡快建立一套方法，提升女童與婦女面對特定挑戰的可視度。這需要優先收集有關進行家務等無償工作的數據，以及對相關數據進行分類處理。■

尼日爾的少女。ONE在其2016年《貧窮是性別歧視》報告中指出尼日爾是女性最受苛待剝削的地方。  
國際培幼會 / Olivier Girard

## 第四章

# 女童分享看法



尼加拉瓜庇護所的女童。庇護所為減少暴力和少女懷孕而設。  
國際培幼會



全球目標其中一項最大的承諾，是在未來 15 年內為數以百萬計的女童帶來生命上的重大改革。

重大改革由瞭解不平等與被排擠的挑戰和根源開始，而瞭解則由聆聽女童展開，特別是那些最受排擠的一群。隨著世界開始實施推展全球目標的行動，親身聆聽她們的需求和優次尤為重要。

國際培幼會於 2015 年在厄瓜多爾、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韋進行了一項研究，題為《讓女童發聲：年輕婦女對行動的態度和建議的四國調查》（Girls Speak Out: A Four-Country Survey of Young Women's Attitud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研究有助我們瞭解上述國家內超過 4,000 名女童的取態和經歷。女童談及她們在學校和公共場合覺得自己有多安全、她們覺得自己對本身的生活和身體有多大自主權，以及她們如何看待暴力。研究更為深入分析她們的日常實況提供了基石。

女童的生活受相交的脆弱性影響，包括她們居住家庭的經濟狀況、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她們是否已為人母。她們的身份也由各種特徵定義，例如族裔、階級、種族、殘障和性別認同。如果相交點有多於一項脆弱性，例如失學和早婚產子，便往往更難於瞭解自己的權利。

為更清楚瞭解不同組別女童的分別和特有經歷，國際培幼會於 2016 年再次在津巴布韋和尼加拉瓜這兩個曾被列為研究對象的國家展開研究。是項研究的目標，是發掘報稱感覺被邊緣化女童的實況，並加深對她們個別經歷的認識。

## 加深瞭解

根據最有可能影響女童生活的全球目標與目的之分析，我們選取了以下探討範圍：給予女童權能的環境、家中的照護和家務、教育質素和價值、早孕、早婚、針對女童與婦女的暴力個案、公共場所的安全、社交關係和人際溝通。

研究一共訪問了 240 名年齡 15–19 歲的女童，以探討多個組別不同的觀點、取態和經歷：年輕母親、已婚女童、失學女童、少數族裔女童和具有相交脆弱性風險的女童。

研究同時採用了量化和質性的方法，包括一項以態度和認知為本的調查、開放式問題，以及聯同每個國家研究人員一同設計的針對個別環境的問題。研究採用了參與式、創意式、批判反思式方法和焦點小組討論的方法。為令研究盡可能更有意義和更具協作性，我們聘用了年輕婦女擔任研究助理（津巴布韋 6 名，尼加拉瓜 10 名）。一眾研究助理參與研究方法以及性別和保障議題的訓練後，進行了實地研究，也參與了有關分析研究結果的工作坊。

本研究的結果並不代表該兩個國家的廣泛人口，並僅應被理解及詮釋為對於在特定地點、環境及特定時間，特徵相近的特定女童組群的一些觀察和見解。然而，結果卻顯示了參與訪問女童的日常實況，並反映出她們的期望。當她們被問及是否認為自己應該在生活上擁有更多上進的機會和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時，兩個國家的絕大部分女童均表示「應該」。

**「沒有人告訴我們或向我們解釋任何與性相關的事情。」**

（來自馬那瓜的年輕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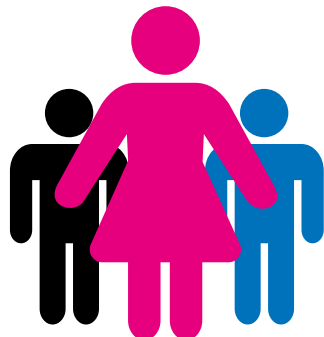


## 大部分女童在公共場所感到不安全



65%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到不安全



59%

在公共場合獨自一人時感到不安全



77%

在入夜後的公共場所感到不安全

119名受訪者中的百分比

## 國家結果：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的女童道出女童與婦女普遍被暴力對待。受訪者經常提及周圍環境中普遍存在性虐待情況。因為年齡和性別，她們的權力備受侵犯，而且無力反抗。

對被性虐待的恐懼與意外懷孕的風險息息相關，女童害怕後果一旦出現，便會為她們的機會和身心帶來負面影響，也限制了她們日後的發展。受訪女童普遍關注自己體能上能否生育，以及生育會否損害健康或致命。那些早孕的女童也提到一些擔憂，包括自己當母親的能力，以及社會對年輕孕婦的偏見。

大部分受訪女童指覺得在家中、在親密關係中和在街上不安全。女童指出她們不覺得在公共交通工具、在公眾場合獨行或在入夜後在公共場合出現是安全的。除了對身體與性暴力威脅的恐懼，她們也回應指害怕在街上被男童與男人出言騷擾。

一位來自馬那瓜西南小鎮南聖拉斐爾的女童在討論小組中表示：「女童在家裡和在社會上都受到形形色色的虐待，有些更被強暴。」同一個討論小組的參與者認為貧窮和資源較少的人們，面對更大的風險。其中一名女童指：「施暴者認為貧窮女童更加脆弱，受害後報警的可能性較低。但另一方面，手上擁有足夠資源、對法例有更佳認識的人，他的聲音會更易被聽到。」

所有尼加拉瓜的受訪女童中，大部分同意性虐待事件應報警處理，並表示她們知道在自己的社區中應向誰求助。她們並表示，相對於告訴家人，她們更有信心向有關當局報告暴力事件。

根據一群年輕母親所述，家庭問題和父母的不良對待為她們的身心和人生選擇帶來了負面影響。在討論過程中，她們表示家人並未讓自己感受到愛、照顧和支持。家人對她們作出身體、性、口頭和感情上的虐待，令她們覺得不安定和寂寞。女童指不覺得有誰願意聆聽她們的心聲，她們也沒有得到忠告，特別是關於性的問題。很多情況下，女童指她們會在家庭以外尋求慰藉和愛，希望可以與男朋友在條件較好和更幸福的家中生活。

一名來自馬那瓜的年輕母親表示：「沒有人告訴我們任何關於性的事情，也沒有人作任何解釋。女童家裡有問題，便會出外找伴侶或令自己懷孕，但求可以停止在家中受苦。」她補充指，有時女童還要面對被親父或其他親友施暴的危機，身為女性也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很多情況下，如果女兒受性暴力襲擊或懷孕，母親會被指責保護不力。博阿科一名受訪者指：「很多女童都因為母親的疏忽





Nury在14歲時懷孕，旁邊是她的母親，她們在尼加拉瓜鄉郊地區生活。  
(國際培幼會 / Miguel Alvarez)

而被強暴。」幾名女童則說母親給子女兒太大自由，也沒有教她們說「不」；而其他受訪者則覺得母親有責任把女兒留在家中而不是讓她們流連街上；另外有幾位抱怨指，日常活動經常受到過分保護的母親諸多限制，希望自己可以更獨立。母親被指沒有把資訊說出，也沒有向女兒提供支持。年輕母親經常表示自己被親母忽視。

一般來說，對於如何處理和改變暴力或性虐待行為問題，受訪者普遍對父親、社區內的男童與男人應負的責任缺乏反思。然而，有一小組年輕母親提出這個問題，指出男童不可以獨善其身。「他們同樣有責任。」馬那瓜一名年輕母親指。「我們應該告訴他們，如果你不想負責任，請採取保護措施。」

儘管大部分女童覺得自己對如何避免懷孕有足夠認識，有三分之一人卻持相反意見。女童對能否取得避孕用品的看法更顯分歧：近半女童同意她們可以取得避孕用品（44%），比率略高於不同意者（41%）。

對於已有親密伴侶的女童來說，要說服對方使用避孕套並不容易。大部分受訪女童（92%）表示她們可以要求伴侶或男朋友

採取避孕措施，但只有 22% 的女童說她們的伴侶或男朋友會真正使用。這些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提高了女童懷孕及患上性病的風險。

女童指出她們曾在學校接受性教育，但認為如課堂重點放在如何正確使用避孕措施，以避免懷孕及感染性病，將會更有用。

絕大部分的女童表示儘管她們的母親在某程度上有跟她們談及性教育和親密關係，但她們希望得到更多。三分之一女童表示希望她們的父親可以跟她們更多談及這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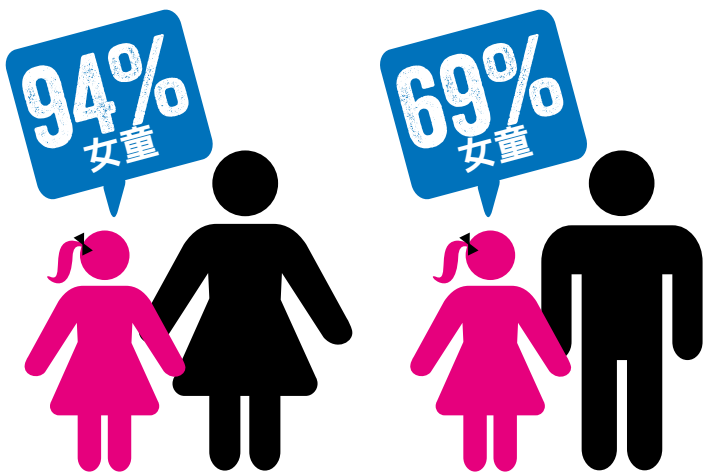
其中一名女童在小組討論時表示：「與父母之間沒有溝通或信任，他們只會認為我們是在跟人約會，發生了事，然後我們就懷孕了。」

雖然家庭環境很多時都沒有滿足女童的期望，但是她們都表示家庭關係對於自己的身心健康、自尊感，制訂目標並付諸實踐的能力非常重要。

年輕母親在尼加拉瓜北部米斯基托社區學習照顧兒童。國際培幼會



## 女童希望與父母討論性和親密關係



希望母親／女性照顧者可以分享更多關於性和親密關係的資訊，並談及這兩個議題

希望父親／男性照顧者可以分享更多關於性和親密關係的資訊，並談及這兩個議題

119名受訪者中的百分比

女童強調有傾訴對象、有人關心她們所面對的問題的重要性。她們用了很多時間討論得到忠告和情緒支援的議題，認為這對她們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絕大部分女童指出這方面的支持來自女性家人，包括母親、祖母和姑孀姨母。然而，年輕母親一組較多提及朋友、心理學家和社區組織，把他們視為較家人重要的支持來源。

少部分女童（10%）表示她們沒有可以對話的人，顯示某程度上被孤立，在身心健康上有風險。這些女童中有大部分是年輕母親，大都只有16歲或以下，她們面對的挑戰大都是在家中受性虐待和暴力對待。

鑑於尼加拉瓜受訪者都認為家庭支援佔據核心地位而且極其重要，失去這種支持和家暴事件，對這些覺得沒有人傾訴、也無路可逃的女童的傷害便極其重大。

學校被很多受訪者視為庇護所。對所有女童來說，在青春後期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與受訪者覺得自己有能力、正面、有更多自尊，以及有「可以成為有用的人」這想法息息相關。除了在校接受核心科目教學，可以增進她們的知識和能力，女童也認為教育能讓她們認識自己的權利。



其中，米斯基托女童把婦女接受教育與她們減少在家中承受暴力的程度聯繫起來。那個社區的女童談到學校是讓她認識自己權利的地方，她們也在這裡更深入地學到家中教導的價值。一名來自博阿科的女孩表示，教育「幫助我變得更正面，並認為自己有能力，而且不只男人可以擁有那種權利。」

在訂立人生目標上，女童多次提及持續教育、轉投職場或取得事業成就。令人鼓舞的是，大部分參與調查的女童都對自己接受教育的機會和質素感到滿意，也表示她們相信教育可以帶來更佳的就業機會。

然而，雖然女童大都表示自己有機會完成中學課程，近四分之一的受訪女童指出她們會因為懷孕或性騷擾而停止接受教育。學校安全繼續成為問題，女童面對被老師虐待的額外風險，特別是貧窮或來自鄉村地區的一群。

並非所有受訪女童都對教育滿意度持正面看法。米斯基托原住民社區的女童便表示對所得到的教育感到失望，並指出老師出勤率和語言障礙等問題。Sisin 市焦點小組的一名女童便表示：「當我們說西班牙語時，同學會取笑我們。所以我們不會繼續說話，也不會繼續嘗試學習西班牙語，學習進度因此停滯不前。」

這個小組的女童覺得，因為父母認為女童最終只會嫁人生子，唸書浪費金錢，所以她們接受教育和完成中學的機會受到限制。米斯基托女童強烈地認為教育制度遺棄了她們，也沒有回應她們的特別需要。

## 國家結果：津巴布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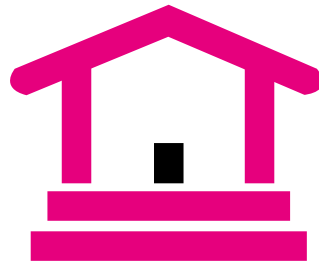
當尼加拉瓜女童不斷討論她們對暴力及其後果的恐懼時，津巴布韋女童的主要關注點卻與經濟相關。

廣泛貧窮不僅影響了她們的健康與身心發展，也增加了輟學風險，最終令她們早婚產子。她們對自己行使權利的能力有頗多討論，認為與家裡經濟條件有著相互或依賴的關係；這也影響女童完成學業的能力。

在所有受訪女童中，有 81% 指出她們遲早需要暫時或永久輟學。絕大部分表示背後原因是經濟問題，而其他則表示早孕、早婚和月經才是繼續學業的障礙。社會不重視女童接受教育，換言之，資源匱乏時，父母會選擇讓兒子而不是女兒上學。

女童表示一旦離開校園，早婚和早孕的風險便會增加。她們表示感到家人和監護人要求結婚的壓力，為的是減輕家庭經濟負

## 對教育機會表示滿意的女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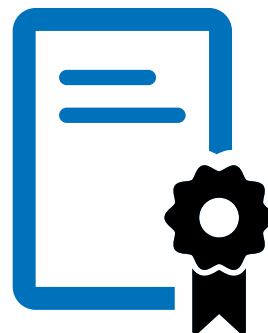
79%

表示女童經常有機會入讀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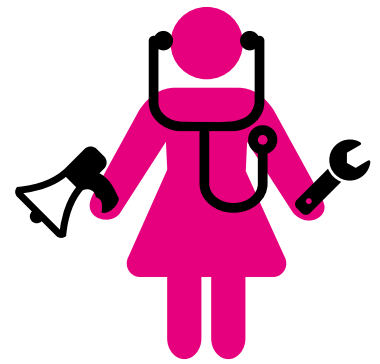
66%

表示女童經常有機會完成中學教育



91%

表示她們滿意所獲教育的質素



90%

相信完成學業可以帶來體面的聘用機會

119名受訪者中的百分比

「教育令我變得更正面，令我覺得自己有能力。」

(來自博阿科的女童)



擔，也避免女童「賦閒在家」。女童本身也表示害怕「賦閒」，指出這代表她們擁有太多自由，並通常導致早孕。

津巴布韋的女童重視學習，也希望完成學業，但這個研究的受訪女童均對自己入學和繼續求學的能力表示不滿。儘管研究中的大部分女童（88%）表示她們有機會接受中學教育，但暫時和永久輟學率卻高得令人咋舌。

與我們對談的女童中，只有三分之一同意與她們年紀相若的女童有機會修畢中學課程。很多女童表示她們不斷被迫輟學。其中一個來自 Redcliff 鎮的女童表示：「我對所獲得的教育並不滿意，因為我沒有學費，難以上學。」

較被邊緣化的組群，例如恩德貝勒裔女童，提及她們更負面的上學體驗。一個來自 Silobela 村偏遠社區的女童便透露一次特別悲慘的上學經驗：「上學只會喚起我生命中的痛苦。我在學校看到其他孩子在小息時能負擔較好的飯餐，我感到很抑鬱，因為我自己什麼都沒有。我只能吃一些野果，所以整天都感到很餓，甚至老師所說的都聽不進耳。」

另一個來自相同社區的女童指，無法完成學業意味像她那樣的女童「沒有美好的未來」。其他人則表示她們很後悔曾經上學，她們覺得上學沒有用，希望自己從來沒有把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學業上。

研究中所有受訪的津巴布韋女童都把教育的價值聯繫到更佳的機會上，特別是工作機會上，可以提升她們和家人的經濟條件。10名受訪女童中有9名相信完成學業可以得到較好的工作機會。

完成學業和重返校園的希望，顯然與透過工作或其他產生收入的計劃（例如養雞）賺取金錢相關。有意思的是，表示未曾輟學的一小群女童都有較遠大的人生目標，並提及會繼續進修和投身專業事業。

與教育相比，女童有時候更重視婚姻，例如恩德貝勒的家庭和社區會令一些女童視婚姻為一項成就。但並不是所有女童都這樣認為。一名女童指：「她們在年紀很小時便被迫結婚……因為我們的文化就是那樣。老一輩應該改變我們的早婚習俗。」

大部分女童覺得早婚的女童需要面對更多複雜問題。一名來自哈拉雷附近 Epworth 鎮的未婚女童說：「她們會過得很苦。她們不會有更好的未來，也沒有計劃令未來更光明。她們現在只能停止上學，以照顧自己的孩子。」

大部分女童同意如果女童在 18 歲前結婚，她們完成學業的可能性會較低。在 44 名已婚的受訪女童中，大部分表示貧窮、

## 大部分女童相信教育可以帶來更好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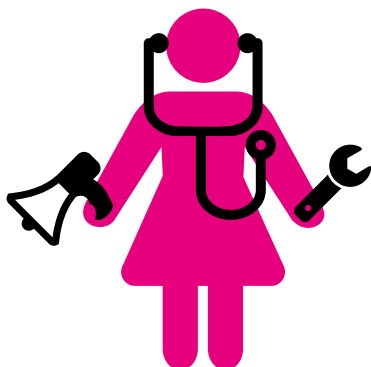
72%

表示女童經常有機會入讀中學



33%

表示女童經常有機會完成中學教育



89%

相信完成學業可以帶來體面的工作

121名受訪者中的百分比



饑餓和缺乏經濟資源都是推動早婚的因素。受訪已婚女童中有 42 名表示她們需要暫時或永久終止學業。

年輕的已婚母親在回想早孕對自身的影響時，提及生產時的併發症、提早退學、被丈夫毆打、為自己的決定感到後悔，以及難以養育自己的孩子。這些挑戰通常都有相互關係。

一名來自 Silobela 村的女童表示：「我希望丈夫不要再打我。我想為家裡出一分力，我希望丈夫也能養育孩子。」當被問到她們有沒有足夠機會尋求更佳發展和達成自己的目標時，已婚女童傾向認為沒有。四名已婚女童中有三名指出，自己未能擁有像男童一樣的平等機會。

此外，大部分已婚受訪女童同意以下說法：年輕時結婚的女童更容易在家中受暴力對待。來自 Silobela 村的女童說：「對已婚的女童來說，遭受暴力對待已成為家常便飯。這些女童年紀輕輕便懷上別人的孩子，因為她們都在掙扎求存。她們沒有上學，因為她們沒有學費，她們除了結婚便沒有其他選擇，婚後大多遭受暴力對待。我很厭倦我丈夫每天都打我。」

暴力也是未婚女童切實面對的問題，特別是孤兒和那些被送往遠親處寄居的，包括後母和叔伯姑丈家。

面對這些挑戰，能夠向身邊人訴說自己的問題，對大部分受訪女童來說都非常重要。正如尼加拉瓜的女童一樣，擁有傾訴對象的津巴布韋女童十分珍視這種關係，也覺得能夠討論問題、得到忠告，令她們大感安慰。大部分女童指她們曾與母親、姑孀姨母和其他女性親友討論問題，也稱她們為支持與力量的來源。

然而，15 名（即超過 10%）受訪女童表示自己沒有可以傾訴的人。這類女童大部分沒有上學或上班，有三位把自己視為家庭中的 24 小時照顧者，凸顯其社交孤立和行動受限制的程度。

得到支援的已婚女童表示，她們的母親或女性親友經常與她們談及婚姻和親密關係，特別是關於婚姻暴力的問題。研究結果顯示暴力在很多人眼中是正常的行為。

其中一名女童指：「我丈夫每天都把我當作出氣袋，他出拳毫不留情。這個丈夫令我很煩惱。奶奶會叫我保持沉默，還說婚姻就是這樣……奶奶給我慰藉，在我生命中提供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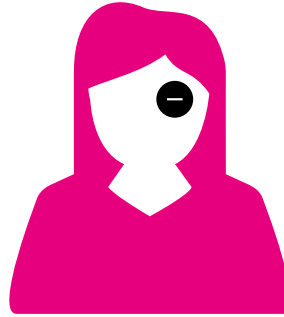


Hope 是一位年輕領袖，在 Epworth 鎮上學。該鎮鄰近津巴布韋的哈拉雷。  
國際培幼會 / Flemming Gernyx

「我丈夫每天都把我當作出氣袋，他出拳毫不留情。奶奶會叫我保持沉默，還說婚姻就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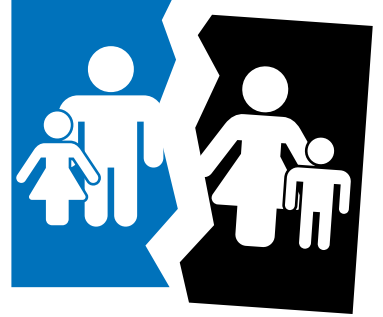
(SILOBELA村的年輕已婚女童)

## 女童認為她們應該為了家庭而接受暴力



84%

認為男孩打女朋友／妻子或對其使用暴力是不能接受的



68%

同意婦女為了家庭完整而忍受暴力

121名受訪者中的百分比

整體而言，女童不認為男朋友或丈夫打她們或使用暴力可以接受，然而，她們卻覺得女性為了保持家庭完整而忍受暴力是可以接受的。無論年紀大小，婦女都認為暴力是她們遲早需要面對的問題。

少於一半的受訪女童不認為和她們年紀相若的女童有足夠機會尋求更佳發展，達成自己的人生目標。當被問及女童是否享有與男童相同的機會時，持反對意見的比率增加至超過三分之二。被問到她們是否應該有更多機會時，10名女童中有9名表示「應該」。

津巴布韋的女童希望生活得更好，但卻面對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包括貧窮和暴力。整個研究清楚顯示她們對達成自己目標、繼續學業、完成教育、獲聘用和賺取收入以改變生活的熱誠。她們認為有關方面應更努力地讓她們可以有效參與建設家庭和社區。



## 初步研究的發現

分析特定的身份和女童經歷的相交脆弱性，可以令我們更深入瞭解她們在實現生命目標、改善現況和社會地位時所面對的特定挑戰和障礙。例如，兩個國家的少數族裔社區女童在教育上的經驗都較廣泛群組的女童負面。為接觸最被排除在外的社群，並為具改革作用的轉變建立所需條件，我們便需要更詳細地瞭解與分析這些相交的脆弱性影響。

按性別和其他維度研究不平等，可以幫助找出特別弱勢社群、推動發展適當政策和計劃回應。

交叉性的方法不一定可以呈現一致的結果。此方法反而會揭露女童與男童生活實況中根深柢固的複雜性，凸顯所需的多元化回應才會有效。例如，要瞭解來自少數族裔女童的經歷，單靠明白她如何經歷性別不平等和族裔歧視並不足夠。我們需要全面瞭解這兩方面如何互相影響和強化。

政策與計劃回應也須考慮到家庭的重要性和複雜性，無論是作為讓女童獲賦予權能機會的環境，還是作為被排斥的推動因素。在研究進行的兩個國家中，女童都提到家庭是她們生命中心，以及她們如何珍視可以和家庭成員傾訴自己的問題以取得支持和意見。另一方面，很多女童形容自己的家庭環境是問題的根源，她們在家裡受到惡劣對待，因為身為女性而被輕視，或被視為家庭中不必要的經濟負擔。這些困難的家庭和家居條件，很多時候都令女童在不自願或認為自己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很早便與人結合、早婚或早孕。

這項研究有力地顯示，我們需要一套細緻和全面的方法來應對針對女童與婦女的暴力行為。要實現結束針對婦女和女童暴力的目標，必須考慮到受影響社群的觀點。例如，很多受訪女童把防止性暴力的責任放在女童的身上。

兩個國家的暴力普遍化，令女童抱有一種錯誤的信念和態度，就是她們只要改變自己，便可避免性虐待、暴力和具風險的性關係。很多女童表示可以透過調整自己的行為來減低風險，例如恰當地穿著和限制自己現身公眾場所。這與致力挑戰現狀及／或聯同男童和男人為女童與婦女推動平等進行倡議，以結束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的方針背道而馳。

同樣地，發掘女童對家務的態度與感知，可以讓我們更深入瞭解在某個特定環境中的性別社會規範。兩個國家的男童都在焦點小組討論中承認女童相對花更多時間在家完成家居瑣務。但是男童認為這些瑣務「輕鬆」，而他們負責的則較男性化，需要更多體力。此外，女童和男童都承認，男童比女童享有較多餘暇時間，以及更多玩耍和學習的機會。

當問到女童工作是否應該更平均地分配時，我們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尼加拉瓜的女童表示感到不公義和不公平，而大部分在津巴布韋接受訪問的女童都不感到有需要改變分工，70%受訪者表示她們相信自己不應該和男童擁有一樣多的自由時間。

一些津巴布韋女童對改變家庭性別角色與責任的既定思維的建議表示驚奇，她們認為家中兄弟或丈夫如被發現打掃家居，他們會感到羞愧和尷尬。

要在未來 15 年創造出革命性的改變，便需更加強調建立關愛和支持的環境，讓所有女童都能夠在安全的空間內掌握知識，並得到鼓勵。應對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和對態度、行為和社會規範作出回應，女童便可以更加自主、得到更多選擇和更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混合使用定量與定質研究的方法，例如在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韋進行的研究，為更強健的性別分析作出貢獻，讓我們可以超越數字，揭示和回應女童與婦女的日常實況，並為真正改變提供巨大支持。

**要實現結束針對婦女和女童暴力的全球目標，必須考慮到受影響社群的觀點。**



# 量度性別不平等的驅動力

**作者：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經濟學家 GAËLLE FERRANT、性別工作聯絡主任 KEIKO NOWACKA 和初級政策分析員 ANNE LISE THIM**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於透過雄心壯志的目的目標和衡量指標實現性別平等有著重大的承諾，這些目標和衡量指標考慮到女童與婦女在享受平等權利、機會和身心健康時所面對的系統性障礙。

其中一個有異於《千禧發展目標》的地方，是確認社會規範在女童和婦女的權利與身心健康中有著重要的角色。有關無償護理工作、有害的習俗和早婚的目標，是在新發展框架中加入這個社會規範角度的例子。量度社會規範和追蹤改變，是支持這些目標進度的關鍵。

追蹤態度、感知和社會規範改變，很多時候都被視為無從捉摸、複雜或具爭議性。過去八年來，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的社會習俗性別指數（Social Institution Gender Index）提出了一套創新的應對方法。透過數據庫和 160 個國家的國家概況，這個量度歧視性社會習俗的跨國計劃，讓我們能夠深入了解有關社會規範和發展結果之間的關係，並就此進行新的研究。

指數透過量度歧視婦女的社會習俗，顯示由立法、作業方式和態度產生的權利與機會性別差距。

歧視性社會習俗包括限制或排斥婦女的正式和非正式法例、社會規範和作業方式，從而剝削了她們運用權利、爭取公義、享用資源和獲賦予權能的機會。生命週期的方法旨在記錄歧視性社會習俗如何在女童和婦女的整段生命中交錯，損害她們作出生命選擇的動力和能力。

重要的是，社會習俗和性別指數顯示此類歧視和不平等不僅為女童和婦女的生活帶來負面影響，也可能窒礙發展目標產生正面結果。使用社會習俗性別指數數據的研究，顯示社會習俗中的性別差距會轉化成勞動力參與和教育等重要賦權範圍的性別差距。<sup>46</sup>

例如，歧視性較高的社會習俗與婦女獲得較低經濟賦權機會相關。社會對婦女應擔任家中主要照護者的期望，令她們只能花較少時間參與有償活動，也解釋了現時勞動市場上部分不平等情況。

投身無償護理工作上所花時間的性別差異增加的時候，勞動力參與和薪金的性別差距也傾向較高。在女性比男性在無償護理工作上花兩倍時間的地方，女性賺取相等於男性薪金 65% 的收入。在婦女所分擔的無償護理工作較為男性的五倍時，她們的收入降至只相等於男性薪金 40%。<sup>47</sup>

同樣地，以童婚為例，社會習俗性別指數研究顯示在女童比男童較有可能早婚的國家，女童較少可能修畢中學課程。<sup>48</sup>

歧視性的社會習俗限制婦女獲得教育與就業機會，這不但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更降低了經濟增長潛力。社會習俗中的性別歧視牽涉重大代價，估計使全球收入損失 12 萬億（美）元，相等於全球收入的 16%。<sup>49</sup>

## 在國家層面理解社會規範

在烏干達與布基納法索進行的社會習俗性別指數研究，並在社會規範如何正面與負面地影響性別平等與發展結果方面產生了新知識和新理解。這些研究為推行度身設計的全國問卷提供機會，設計出向女性和男性提出的問題，涵蓋創業精神以至基於性別的暴力。

在環球與國家層面取得的經驗，凸顯了社會規範在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國家和組織如何能夠和應該在他們的評估、政策與策略中加入社會規範的角度。

烏干達國家研究採取了參與性的方針，以確保其回應國家在性別平等上的優先工作，並找出國家內存在的特定歧視形式。採用的方法包括向決策者、研究人員、公民社會組織和發展專家作全國諮詢；成立技術諮詢小組；以及由歧視性社會習俗的全國專家撰寫深入背景文件。

研究同時採用定質與定量的方法，擷取歧視性的社會習俗和填補數據缺口，包括在 28 個地區進行焦點小組討論和主要資料提供者的訪問。這有助微調定量部分的設計，為定量調查的結果加入輔助資料，並就識別參與社區如何理解性別不平等問題促成進一步細緻調整。



## 認為女童早婚是正面的地區，早婚率較高

烏干達問卷包括兩個單元，即住戶與個人，調查在全國所有地區和區域進行。調查樣本包括了超過 3,600 個住戶，在設計上可以在全國、城鄉和次區域層次進行估算。每一個住戶都訪問了年滿 18 歲的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訪問人數超過 5,70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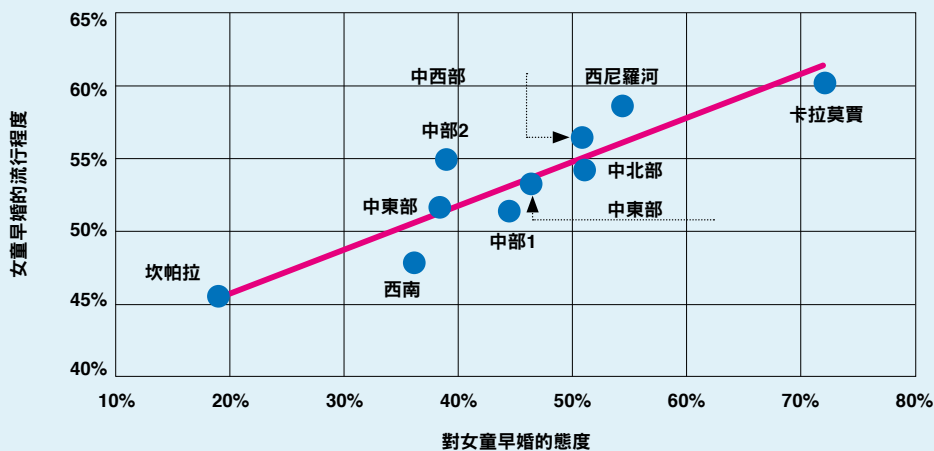
### 結束早婚

研究結果清楚顯示社會規範和習俗如何影響女童早婚的趨勢。雖然烏干達打擊早婚的倡議活動因為法律改革而取得巨大進展，但將重點放在改變社會規範上有助早日消除早婚。

儘管烏干達憲法把女童和男童的法定婚齡定為 18 歲，<sup>50</sup> 但《習俗婚姻法案》(the Customary Marriage Act) 卻允許例外狀況，容許女童在 16 歲成婚。<sup>51</sup> 這些法律框架內的相異之處，解釋了為何消除這種帶歧視成分的社會制度的工作會停滯不前。

雖然女性在 15 歲或以前結婚的比例已隨時間有所降低，由 45–49 歲婦女中佔 19% 減少至 15–19 歲婦女中的 3%<sup>52</sup>，但早婚仍然在烏干達廣泛實行。女童與男童的比例分歧也持續高企：截至 2011 年，有近半介乎 20–49 歲的婦女在 18 歲時已成婚，但 25–49 歲的男性中只有 9% 在 18 歲前已成婚。<sup>53</sup>

女童早婚率在坎帕拉等市區地方最低，但在烏干達的中北部、東部和東中部卻較高。這些地方的婦女，三名中有兩名在 18 歲前已婚，每三名女童中有一名在 16 歲前結婚。習俗法例和習俗容許早婚，有助解釋為什麼不同地區早婚的普及情況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烏干達性別和習俗數據庫 (巴黎：經合組織)，<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GID2> (只有英文版)

對於女童早婚的看法，也是決定早婚是否普及的重要因素。認為女童早婚是正面的地區，女童早婚率較高。當然，這對於女童和男童的影響也非常不同：近 50% 烏干達社會習俗性別指數調查的受訪者同意女童該在 18 歲前結婚，但只有 15% 受訪者同意男童應在 18 歲前成婚。在卡拉莫賈，這些數字分別攀升至 72% 和 26%。

烏干達的其他婚姻習俗也反映和影響女童在家庭中的地位。新娘禮金是傳統的婚姻習俗，女孩的家人會從未來丈夫和他的家人手中收到新娘禮金。新娘禮金被 78% 受訪者視為「普遍」，92% 受訪者更認為它是「必需」的。

對於大部分烏干達人來說，新娘禮金授予丈夫擁有未來新娘的權力 (72%)，讓女孩擁有地位 (93%)。這在卡拉莫賈尤甚，那裡大部分人都同意以下說法：「婚姻需要支付新娘禮金」、「如果男人為妻子付了新娘禮金，便表示她是屬於他的」和「新娘禮金讓女孩有地位」。

### 前所未有的機會

社會機構和性別指數和其社會規範方法，在如何進一步推進性別平等上提出了重要的新問題，這與全球目標中所訂立的社會變革願景尤其相關。烏干達社會機構和性別指數有關早婚的研究結果顯示，法例、社會規範、看法和認知組成了女孩行使自己權利和享受被賦予權能機會的主要參數。

雖然一般被視為難以量度，烏干達研究的結果顯示，提出社會規範的新問題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以回應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和加快工作進度。

性別統計的進一步投資，特別是關於社會規範的數據，將提升我們瞭解社會制度中各種歧視問題如何互相影響，以及它們對女童和婦女造成的影響和後果。把社會規範數據轉化為可以對抗和改革這些障礙的有效政策方案，將成為實現 2030 年議程核心追蹤和支持改變的重要一環。■

## 第五章

# 採取行動的呼籲



女童在位於中國廣南縣的學校吃午飯  
時歡笑  
國際培幼會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把全球目標的抱負付諸實行。來自政府、發展合作夥伴、公民社會和私營界的投資和創新發展相當重要。要量度與監察全球目標的進度，未來需要動用大量資源進行協調工作，估計每年成本約為 10 億美元。<sup>54</sup>

對推行全球目標的真正承諾，來自政府把諾言轉化為國家的優先工作和投資，還有就進度承擔責任。政治領袖和公民社會必須要求政治領導人和社會必須要求取得數據和分析，以便做出明智的決策和實施。我們必須制訂穩健和具參與性的問責機制，以此要求政府履行本身在國家、地區和全球的義務。

這個合作關係的第一步，是認定讓每位女童和婦女都能發揮所長、都被計算在內的世界不僅是可能的，更是量度進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致力整理我們所知道的、評估我們所不知道的，並為如何填補我們需要知道的缺口提供有用的分析。我們將向捐獻者、聯合國和多邊組織、政府、私營界和公民社會倡議，呼籲各界：

## 加大力度推動性別數據革命

達致性別平等的工作，因為缺乏關於婦女與女童的全面、可靠資料而受阻。如果要在 2030 年實現全球目標，我們在關於女童與婦女的生活、身心健康和福祉的現有知識

取得更大進步尤為關鍵。這些進步之處必須包括填補性別數據缺口、改善現有數據收集與分析，以提供更多更全面的關於性別和防止女童與婦女進步的障礙的資料。

## 在國家統計學能力上投放資源並加以鞏固

要了解女童與婦女的生活，我們已掌握部分需要的資料，儘管有關最被排斥社群的資料仍然嚴重缺乏。我們對於不足之處有一些認識，很多缺口需要填補，以及一些數據雖然存在但是並沒有得到有效分析或使用。在我們展開填補數據缺口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加強、分析、分類和補充現有的豐富數據。

因為各種技術、法律、能力和政治原因，改善性別數據將無可置疑地成為統計學社群面對的挑戰。但是尋找加強能力和克服那些挑戰的方法卻是必須的。只有透過穩健與可靠的數據，才可以實現接觸最被排斥的一群，並實現全球目標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這雄心壯志。

## 接受不同種類與來源的數據收集和分析

如果官方衡量指標得到感知為本的數據、定質數據和來自市民的數據，以及可靠的非政府機構和組織的數據輔助，便可以變得更有力。所有此類數據可以用於引起公眾辯論、讓一般情況下未獲充分關注的問題得到關注，並提供更全面的實況。詢問人們關於他們自己身心健康看法，也可以令公眾更為負責。

由公民社會、智庫、基金會和學者製作的另類與補充研究和報告亦非常重要，可確保情況得到全面和具分析性的看法，以配合官方的國家報告工作。另類報告讓公民社會可以為環球問責作出貢獻，否則市民也沒有機會參與政府報告，和重點指出政府沒有提出及忽視的問題。

我們需要以上所有資料，以確保我們在未來 15 年可以準確量度和回應女童與婦女的生活變化及她們的看法。

## 同心協力！

### 使用數據與證據推動行動和建立運動。

如果數據沒有發佈和應用於決策、投放資源和行動上，又或如果所使用的數據和證據沒有準確反映人口的實況，即使最優質、最完整的數據集也變得無關痛癢。沒有增加按照數據倫理產生、讀取和分析數據的能力，並用以推動行動，革命性的改變將難以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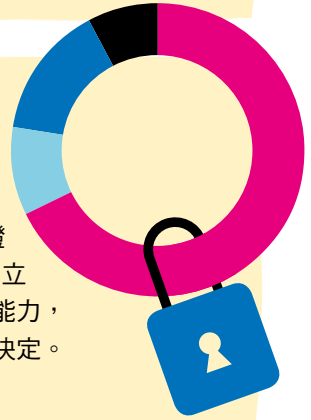
我們應謹記，每一個數據點背後都代表著一個生命、一個家庭，或一組有故事要說的社群。隨著數據點改變，影響不只出現在圖表上，而是它們所代表的人們的真實感覺。

數據不只是數字，也包括了數字背後的故事，放諸爭取女童和婦女權益的倡議者手上，可以是極具力量的工具。那些倡議者應擁有有效使用性別統計的技巧，而國家統計處則需要擁有強大的能力，以對用者和年輕人友善的方法表達數據。把數據變成人們可以使用的知識，並為他們提供機會把知識付諸行動，讓他們可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身邊的世界。

### 確保數據收集與分析安全和符合道德標準。

我們知道知識就是力量，而力量很容易被濫用。處理數據時，特別是關於世界上某些最弱勢和最被排斥的人的數據，私隱與公信力的問題尤其重要。確保所有人免受可能出現的因數據濫用造成傷害，是成功推動性別數據革命的重中之中，而保障安全是所有人所應負的責任。

要得到信任與應允，公眾必須對所有持份者都能夠及實踐他們的工作具備信心，包括創造與執行法律框架以保證數據的私隱與安全，確保數據質素和獨立性，並提升市民參與和評估數據質素的能力，讓他們得以使用數據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決定。



### 加入運動，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作用

各方協作將成為女童與婦女的性別數據革命的基石：不同領域的組織和專家必須合作，分享知識、資訊和最佳作業方式，查明可以透過互相合作來解決共同問題的範圍，合力填補重要的數據空白。

政治意願是基本的組成部分，作為守護人權職責的一部分，各國政府有責任確保其有能力以不產生任何傷害的方式，建立、分析和發佈性別數據。捐獻者可以透過多種方式支持這方面的工作，包括但不限於就建立能力、倡導和問責上提供財政與技術協助。

私營機構夥伴可以透過與各國政府和公民社會分享相關數據的形式參與，也可以幫助研發創意方法收集和編整資料，把資料交到需要它們的單位手中。

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可以繼續提倡更多質量更佳的數據，以市民建立的數據或由可靠組織和機構收集的數據來補充

官方數據，並特別指出數據構成影響的例子。他們可以提升工作社區內的基礎數據能力，與那些社區分享有關數據，確保他們本身的數據分享具問責性而且以人權為本。

媒體的角色亦不可缺少，包括報導問題、幫助人們瞭解使用性別數據的需要，以及全力協助呼籲各界作出實際行動，建立有關女童與婦女平等議題的資料庫。

市民也可以參與，透過積極使用和分享數據，尋找建立基礎數據能力的機會，以及督促收集和建立數據的單位負責。

總括而言，是項研究的目的是呼籲各國民眾採取行動。我們呼籲製作數據者把數據發佈並讓數據易於使用；使用數據者則在數據上凸顯女童和婦女情況，而手上沒有數據者則提出取得數據的要求。

我們必需做好本分，讓不被正視的問題得到正視。我們必須確保每一位女童和婦女都可以發揮所長，並不再被隱形。



## DATA2X識別的關鍵性別數據缺口

在其提升性別數據質素、可用性和使用的工作中，Data2X根據需要、人口覆蓋和政策相關性找出了28個缺口。

下表概述了健康、教育、經濟機會、政治參與及人類安全這五大主要領域中28個已發現的缺口。

詳情請參閱<http://data2x.org>（只有英文版）

data2x

partnering for a  
gender data revolution

範疇	性別數據缺口			
	多國缺乏調查及／或國家沒有定期調查	缺乏可供比較的國際標準	缺乏複雜性：跨越範疇的資料	缺乏精細度：容許分類的詳細數據集
<b>健康</b>				
孕產婦的發病率與死亡率	●			●
婦女的額外疾病負擔	●			
針對婦女的暴力	●		●	
精神健康	●		●	●
青少年健康	●		●	●
婦女使用醫療服務	●			●
<b>教育</b>				
學習成果	●	●		
排除女童	●	●		
轉學率	●			
<b>經濟機會</b>				
無償工作	●			
非正式就業	●			
有償工作的收入與機會成本	●	●		
外來民工的情況	●	●		
就業流動性	●	●		
創業精神	●			
資產擁有權	●			
農業生產力	●	●		
得到金融服務	●			
得到兒童照護	●	●		
可使用流動電話與互聯網	●	●		
<b>政治參與</b>				
成為當地政府、政治組織和專業界別代表	●			
國民身份的文獻紀錄	●			
選民登記與投票率	●			
<b>人類安全</b>				
與衝突相關的死亡率與發病率	●			
被迫流離失所與移徙概況	●			
性別變數衝突的影響	●			
與衝突相關的性與基於性別的暴力	●			
參與和平與安全進程	●			

# 參考資料

1. 梅琳達·蓋茨，《AGirlsandWomen'sLensontheSDGs》，Women Deliver的第四屆環球會議演講辭（哥本哈根，2016年5月7日）。（只有英文版）
2. 聯合國統計司，《ProvisionalProposedTiersforGlobalSDG Indicators》（紐約：聯合國，2016年），第17-19頁。（只有英文版）
3. Jeffery Sachs等，《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和指示板：全球報告》（紐約：貝塔斯曼基金會與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2016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組織譯，第9頁。
4. 世界衛生組織，《孕產婦死亡率》，實況報導第348號（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11月更新），<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48/zh/>。
5. 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報告2015摘要》（紐約：聯合國，2015年），第4頁。
6. 聯合國，《2016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紐約：聯合國，2016年），第20頁。
7. 各國議會聯盟，《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Situation as of 1 June 2016》（日內瓦：IPU，2016年），<http://www.ipu.org/wmn-e/world.htm>。（只有英文版）
8.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教學與學習：實現高品質全民教育：性別問題摘要》（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4），第37頁。
9.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Leaving No One Behind: How Far On the Way to Univers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第27號政策文件／實況報導第37號（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6年7月），第2頁。（只有英文版）
10. 聯合國，《2016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紐約：聯合國，2016年），第21頁。
11. 聯合國統計司，《The World's Women 2015: Trends and Statistics》（紐約：聯合國，2015年），第106頁。（只有英文版）
12. 聯合國，《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紐約：聯合國，2015年10月21日），第2頁。
13. WASHplus，《WASHplus End of Project Report: What We Did and Why It Matters》（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國際開發署，2016年7月），第37頁。（只有英文版）
14. BLE Solutions LLC，《Executive Summary: Evaluation of Let Girls Lead's Adolescent Girls' Advocacy and Leadership Initiative, January 2009–June 2013》（Let Girls Lead，2013年）。（只有英文版）
15. 聯合國人口基金，《Schools for Husbands Gaining Ground in Rural Niger》（尼亞美：聯合國人口基金，2014年6月17日），[www.unfpa.org/news/schools-husbands-gaining-ground-rural-niger](http://www.unfpa.org/news/schools-husbands-gaining-ground-rural-niger)。（只有英文版）
16. Jerker Liljestrand與Meatnan Sambath，《Socio-economic Improvements and Health System Strengthening of Maternity Care Are Contributing to Maternal Mortality Reduction in Cambodia》，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第20卷，第39冊（倫敦：2012年），第62-72頁。（只有英文版）
17. Hans-Peter Kohler與Jere R. Behrman，《後2015 發展議程人口與人口統計學目標的好處和成本》，人口與人口統計學評估文章（哥本哈根共識中心，2015年10頁），第48頁。（只有英文版）
18. Amber Peterman，《Benefits and Costs of the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Targets for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卷47，第1冊（2011年1月）。（只有英文版）
19. 聯合國統計司，《Gender Statistics Manual: Integrat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Statistics》（聯合國，2013年5月14日修訂），<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statmanual>。（只有英文版）
20. 聯合國人口基金，《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2013: Motherhood in Childhood;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dolescent Pregnancy》（紐約：聯合國人口基金，2013年），第4頁。（只有英文版）
21. 聯合國，《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Gender Chart》（紐約：聯合國，2015年），<http://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6/2/gender-chart-2015>。（只有英文版）
22. 聯合國秘書長可持續發展數據革命獨立專家諮詢小組，《A World That Counts: Mobilising the Data Revolu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紐約：獨立專家諮詢小組，2014年11月），第14頁。（只有英文版）
23. 聯合國統計司，《The World's Women 2015: Trends and Statistics》（紐約：聯合國，2015年），第xv頁。（只有英文版）
24. 聯合國秘書長可持續發展數據革命獨立專家諮詢小組，《A World That Counts: Mobilising the Data Revolu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紐約：獨立專家諮詢小組，2014年），第12頁。（只有英文版）
25. 此報告採用了以下聯合國統計司的定義區分「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的概念：「『生物性別』一詞指女性與男性之間的生理差異。生理差異是固定和無法改變的，也不會因不同文化或時間改變。另一方面，『社會性別』指社會根據作為女性和男性的特質和機會，以及女性與男性之間的社交互動和關係而建構的差異。」聯合國統計部門，《What Are Gender Statistics》（聯合國，2015年5月1日修訂），<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statmanual/What-are-gender-stats.aspx>。（只有英文版）
26. Saul Guerrero、Sophie Woodhead與Marieke Hounjet，《On the Right Track? A Brief Review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the Humanitarian Sector》（倫敦：Action Against Hunger International及Consortium of British Humanitarian Agencies，2013年），第8頁。（只有英文版）
27. Naila Kabeer，《The Challenges of Intersecting Inequality》，收錄於《Group Inequality and Intersectionality》，Maitreyee Association，2014年7月），第5頁。（只有英文版）
28. Jeffery Sachs等，《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和指示板：全球報告》（紐約：貝塔斯曼基金會與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2016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組織譯，第9頁。
29. 聯合國秘書長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標機構聯合專家組，《Data and Indicators for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紐約：聯合國，2016年），第58頁。（只有英文版）
30. 見：Martin Valdivia，《Business Training Plus for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Short and Medium-Term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Peru》工作文件，（利馬：Grupo de Análisis para el Desarrollo，2014年5月）；及Franck Adoho等，《The Impact of an Adolescent Girls Employment Program: The EPAG Project in Liberia》第6832號政策研究工作文件（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世界銀行，2014年4月）。（只有英文版）
31. Michael O'Sullivan等，《Levelling the Field: Improving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Farmers in Africa》（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世界銀行與ONE Campaign，2014年），第10頁。（只有英文版）
32. Elena Bardasi等，《Do Labor Statistics Depend on How and to Whom the Questions are Asked? Results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Tanzania》，第5192號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銀行，2010年1月），第39-41頁。（只有英文版）
33. Louise Fox與Obert Pimhidzai，《Different Dreams, Same Bed: Collecting, Using and Interpreting Employment Statistic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Case of Uganda》，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6436號（世界銀行，2013年5月），第14頁。（只有英文版）
34.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A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Data: Leaving No One Behind in the 2030 Development Agenda; Guidance Note to Data Collection and Disaggregation》（日內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2016年2月19日）。（只有英文版）
35. 見：聯合國大會，「2014年1月29日大會決議：官方統計基本原則」，A/RES/68/261（紐約：聯合國，2014年3月3日）。
36.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Measuring and Responding to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Kiribati: Action on Gender Inequality as a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馬尼拉：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2013年），第1頁。（只有英文版）
37. 太平洋社區秘書處，《Kiribati Family Health and Support Study: A Study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奴美亞，新喀里多尼亞：太平洋社區秘書處，2010年），第2頁。（只有英文版）
38. 歐泰瑪（Teima Onorio），《Statement by Vice-President of Kiribati, Honourable Ms Teima Onorio for the 57th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2013年3月）。（只有英文版）
39. 印度國際培幼會，《Stories of Change: Upholding the Rights of the Girl Child》（新德里：印度國際培幼會，2014年）第4頁。
40. 印度人口普查組織，《Punjab Population Census Data 2011》，<http://www.census2011.co.in/census/state/punjab.html>。（只有英文版）
41. 印度國際培幼會，《Stories of Change: Upholding the Rights of the Girl Child》（新德里：印度國際培幼會，2014年），第5頁。（只有英文版）
42. ONE，《Poverty is Sexist: Why Girls and Women Must Be at the Heart of the Fight against Extreme Poverty》（ONE，2015年）。（只有英文版）
43. Taryn Dinkelman，《The Effects of Rural Electrification on Employment: New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101卷第7冊（2011年11月），第3078-3108頁。（只有英文版）
44. ONE，《Poverty Is Sexist 2016》，可於以下網址下載：<https://www.one.org/usa/take-action/poverty-is-sexist/#report>。（只有英文版）
45. Bread for the World Institute，《2015 Hunger Report: When Women Flourish... We Can End Hunger》（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世界麵包組織，2015年），第36頁。（只有英文版）
46. Gaëlle Ferrant、Keiko Nowacka與Annelise Thim，《Living Up to Beijing's Vision of Gender Equality: Social Norms and Transformative Change》（巴黎：經合組織發展中心，2015年3月），第6頁。（只有英文版）
47. Gaëlle Ferrant、Luca Maria Pesando與Keiko Nowacka，《Unpaid Care Work: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Analysis of Gender Gaps in Labour Outcomes》（巴黎：經合組織發展中心，2014年12月），第6頁。（只有英文版）
48. Gaëlle Ferrant與Keiko Nowacka，《Measuring the Drivers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ir Impact on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Discriminatory Social Institutions》，《性別與發展》，第23卷，第2冊（2015年），第319-335頁。（只有英文版）
49. Gaëlle Ferrant與Alexandre Kolev，《The Economic Cost of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in Social Institutions》（巴黎：經合組織發展中心，2016年6月）。（只有英文版）
50.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Uganda, 1995年，31（1）段。（只有英文版）
51. Customary Marriage (Registration) Act 1973 (Ugand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第一部分，第11段，<http://www.ulii.org/ug/legislation/consolidated-act/248>。（只有英文版）
52. 烏干達統計局，《2011 Uganda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坎帕拉，烏干達：烏干達統計局，2012年8月），第50頁。（只有英文版）
53. 同上。
54. 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等，《Data for Development: A Needs Assessment for Global Goals Monitoring and Statistical Capacity Development》（可持續發展行動網絡，2015年4月15日），第6頁。（只有英文版）





BECAUSE  
**I am a  
Girl**  
愛 · 女孩



## 關於國際培幼會

國際培幼會致力爭取兒童權益及為女童爭取平等待遇。我們明白每一位兒童的力量和潛能，但這些能力往往因為貧窮、暴力、排斥與歧視而被抑制，女童更是最受影響的一群。

作為一個獨立發展與人道組織，我們與兒童、年輕人、我們的支持者和合作夥伴一同努力，應對女童與所有弱勢兒童所面對挑戰的根本原因。

我們支持兒童由出生至踏入成年期期間的權利，並讓兒童作好應對危機與逆境的準備。我們透過本身涵蓋的地域、經驗與知識，在地區、國家與環球層面推動作業方式與政策改革。

透過本會的工作，我們力求重視女童，並停止對她們的不公義，讓她們可以實現自己的權利。「愛·女孩」是本會現時最重要的環球倡議，是一項由國際培幼會推動的運動，致力確保各地的女童都可以學習、領導、決定和茁壯成長。

超過75年來，我們一直為兒童建立強而有力的合作夥伴關係，本會現時活躍於全球超過70個國家。

© 國際培幼會 2016  
國際培幼會（香港）  
香港筲箕灣興民街68號海天廣場201室

網站：[plan-international.org/girls](http://plan-international.org/girls)  
請在Facebook/planinternational或Twitter @planglobal追蹤我們